



这张图片拍摄于2011年8月份，从起义街上可以直接看到起义门城楼。街道上商铺众多、行人如织，有着浓浓的烟火气，可以瞥见当时武昌城市风貌。起义门始建于明朝，原名中和门，是武昌古城九城门之一。在近现代史上起义门见证着辛亥革命的历史，是不可绕过的重要地标。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后，湖北新军迅速攻占此门，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起义街和明伦街也是武汉解放后较大的回民聚集区，形成了有名的清真食品市场，图中可见几处清真店铺。起义门周边的保安街、广里堤也是历史底蕴丰厚的老街，如今也已进行拆迁改造。我用这些照片来记录老城变迁，希望可以留住武汉城市记忆。

（供图 / 撰文 麻建雄）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董菲 杨华
刘洪波 熊少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燕来宾 潘红莲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玮

编辑：许濛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4 1984, 武汉市树市花迎春问世 / 蒋彤云 杜宏英

风雨同舟



12 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十个经典故事(下) / 胡照洲

九城同心



19 “步上西山寻野梅”
——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中) / 夏建国

委员天地



24 做武汉“红楼”的守护者
/ 魏德勋(口述) 章旷怡(整理)

商聚汉皋



28 争做汽车电子业的领跑者 / 郑海法(口述) 高爱民(整理)

目录

CONTENTS

人物春秋



- 32 “坚信马列志不移”
——董必武早期思想的转变之路(下) / 田子渝
- 38 从武汉三中体操队走出舞蹈人生
/ 刘天喜(口述) 刘宝森(整理)

史海钩沉



- 43 武昌地名的由来与黄鹤楼故址 / 刘谦定

高校访馆



- 51 桂子山上的亮丽名片——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 / 罗松

往事漫忆



- 55 武汉大学校园环境整治
/ 徐应荣 任珍良 刘家旭(口述) 任怡(整理)

都市史话



- 60 解放初期武汉房屋的状况与修缮 / 方宏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价：8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84，武汉市树市花迎春问世

◇ 蒋彤云 杜宏英

轮印：1984年3月17日，经武汉市七届人大会议审定，命名水杉、梅花为市树市花。40年来，水杉、梅花彰显武汉人精神特质，展现江城人文底蕴，寄托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全球获得广泛美誉。

1983年3月，全国“为美化城市作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授奖大会”在京举行，万里副总理发表讲话时透露：国家正酝酿评选中国国花。

消息从北京传来，武汉从1983年5月开始，掀起市树市花的评选热潮，市民踊跃参与投票。1984年3月17日，经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武汉市树水杉和市花梅花，迎着初春的气息挺立绽放。

全市评选万人投票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勃兴，创造优美环境成为城市的追求，各地竞相提出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目标，中国国花和城市市树市花的评选活动此起彼伏。

1982年4月19日，南京命名梅花为市花。1982年6月1日，广州批准红棉花为市花。1982年8月20日，南通确定菊花为市花。1983年2月2日，无锡将杜鹃花作为市花之一……

武汉敢为人先。据《武汉园林(1840-1985)》记载：早在1982年9月，市园林局与园林学会就开始酝酿市树市花评选，并召集专家学者座谈，制定出评选原则和方式。



东湖梅园放鹤亭

同时，结合江城的风物特点，推荐水杉、银杏、柳树、樟树、朴树、法桐、池杉、白玉兰、广玉兰、枫香等优良树木和梅花、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腊梅、紫薇、石榴、栀子、杜鹃等美丽花卉各 10 种，作为候选的市树市花。1983 年 2 月，评选活动获市政府批复，随后成立了由相关领导、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

1983 年 5 月 22 日，市树市花评选投票正式开始，评委会联合《长江日报》推出系列宣传活动造势。当天《长江日报》第二版发表评委会副主任之一、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湖北省暨武汉市植物学会理事长孙祥钟教授的文章《大家都来评选市树市花》，呼吁市民积极参与投票。孙教授在文中提出引导性建议：“最好选择我国原产树种和花卉，选择那些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较高、适应武汉地区生长并为武汉人民喜爱的树和花。”且“评选出来的市树市花，要有本地的特性、容貌和色彩，使人能形象地联想到它们具有某种性格，足以代表武汉人民的精神风貌。”

第二天，《长江日报》第二版又刊载《名树名花任君选》，公布市树市花候选名单和

选票，并逐一介绍 20 种树木花卉的特点。其后，为进一步引发市民对花木的兴趣，《长江日报》“黄鹤楼”专刊，从 5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开设“名树名花赞”专栏，连续刊载荷花专家张行言《荷花，武汉的象征》、花卉专家王其超《水杉，祖国的骄傲》、市园林局第一任园林科科长毕庶昌《柳色青青染江城》、梅花专家赵守边《红梅朵朵映江城》、园林专家余开来《石榴花，火热的心》及傅云英《绰约仙子白玉兰》、姜騫《池

杉，武汉第二故乡》、江仁忠《妙哉，悬铃木》、张忠利《银杏，“有生命的纪念塔”》、马祥云《中秋花发桂枝香》、佟文浩《枝柯参天古朴树》、周绍馥《幽馥消暑栀子花》、田长怡《红叶林笼鹦鹉洲》、钟达兰《唯有兰花香正好》、吴桂芳《广玉兰，开在树上的荷花》、郭敏琼《杜鹃花，众芳中的西施》、郑德湘《紫薇花开百日红》、程玉琨《菊花犹有四季姿》、张新民《全身是宝的樟树》、薛露华《枝碧蕊黄腊梅花》等 20 篇科普文章，帮助市民赏析候选市花市树的植物习性、文化底蕴及与武汉的因缘。由此，市树市花评选活动热潮滚滚。

经过两个多月的市民投票，评委会共收到选票 12750 张，水杉以压倒性优势（5817 票）居 10 个树种之首，荷花和梅花则分列花卉第一和第二。在梅花还是荷花的选择上，评委会先后召集评委研究、专家讨论和市政协委员座谈，大家一致选出梅花为市花。

1984 年 2 月 17 日，市政府作出“市树宜选水杉、市花宜选梅花”的建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定。3 月 17 日，市七届人



东湖梅园梅妃亭

大二次会议宣布命名。为此，评委会特制作明信片以作庆贺纪念，上载：“滔滔江汉，物阜楚利。白云黄鹤，鼎列三镇。市树水杉，枝干挺拔，叶似翠羽，遍植在它的故乡江城。市花梅花，虬曲苍劲，暗香采雪，象征着武汉人民的精神。市树市花的评选者，水杉、梅花寄托了你们对武汉的深情，让我们和全市人民一道，用美创造生活，为灿烂的明天而奋进！”

武汉市民选择水杉、梅花作为市树市花，一是感于水杉、梅花之斗雪傲霜、志向高洁的风骨；二是考虑湖北是水杉、梅花的故乡，其种植规模与研究在全国名列前茅。

探寻水杉、梅花的足迹，发现武汉与水杉、梅花渊源颇深。

水杉惊现湖北利川

水杉，一种古老而充满传奇的树种，有“天下第一树”之称。它原生长于中生代白垩纪和地质新生代的北半球，历经漫长的多个冰河期和第四纪冰川后，几近绝迹，一度被世界植物学家认为早已灭绝。直到

1941年被发现于湖北利川，引起全球科学界震惊，正所谓“亿年远裔今幸存，绝域闻风剧惊异。”

水杉属水杉科水杉属，是我国最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人称“活化石”。据史料记载，水杉的发现与湖北广济人干铎有关。

干铎，我国著名林学家、林学教育家，中国当代森林经营学的开拓者之一，主编有《森林经营规划学》。1941年10月底，干铎辞去在恩施的湖北农业专科学校教职，前往重庆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途经四川万县的磨刀溪（今湖北利川谋道溪）时，见路旁有一株高约30余米的落叶大树拔地参天。凭专业直觉，干铎认为非同一般，立即停下来仔细观察，但未能弄清此树种、属。



湖北利川谋道“水杉王”

于是向老乡打听,得知该树俗称“水杪”,在当地视为“神木”,建有“水杪庙”香火供奉。遗憾的是,此时正值深秋,“神木”枝叶落尽,不宜采集标本,干铎便委托好友、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师杨龙兴翌年去采集。之后,干铎对“水杪”念念不忘,时常与同仁、学生提及,1948年还带领助教赫文荣、华敬灿进行“水杉之树杆解析”研究。

1943年,中央林业实验所王战由重庆赴湖北恩施,考察神农架路过万县,从友人杨龙兴口中得知“神木”的存在,辗转到磨刀溪采集标本,带回重庆后鉴定其为“水松”。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郑万钧持不同意见,认为其是“新的植物”。为解开“水杪”身份之谜,郑万钧在1946—1948年间,先后六次派其研究生薛纪如(两次)、助教华敬灿(四次)前往磨刀溪采集标本。

在六次科学考查中,以华敬灿1947年8到11月的第一次收获最为丰富,他不仅采集标本200多号约3000份、成熟种籽约2公斤、水杉及其它树木野生苗一批,还在利川西南部一条发源于齐岳山与佛宝山汇合处的小河河谷上游,发现一个叫“水杉坝”的地方,广布有上千株水杉及小片水杉林。在利川西部的汪家营南山坡庙前,更发现一株树高50米、直径3.3米、冠幅13米的一株千年水杉(可惜1951年遭雷击被毁)。这些,为水杉鉴定提供了较完整的标本材料。

1948年,中国植物学先驱胡先骕和郑万钧通过采集回的水杉标本,与水杉化石反复比对后,正式定名为“水杉”,推翻了西方“水杉早已灭绝”的定论。干铎发现的那株“水杪”,也被称为“水杉王”。



利川“天下第一杉”

水杉的发现,称为20世纪世界植物界最伟大的发现。从发现到正式定名历经八年,其间浸透了众多中国植物学家的艰辛努力,如同中央大学教授丁骕在《水杉发现的重要意义》中所写:“水杉的发现者应该归功于三个人。第一个是唤起注意的干铎先生,第二个是鉴定而且认其为新属的郑万钧先生,第三个是比较而发现它与化石相同的胡先骕先生。”其实,在水杉的艰难考证之旅中,还有王战、薛纪如、华敬灿先生,甚至还有杨龙兴先生。正是因为他们,中国水杉才在今天广布全球80多个国家,功勋彪炳史册。

水杉是世上少有的孑遗植物之一,利川“水杉王”“水杉坝”的相继问世,引起国内外植物学家广泛关注与重视。郑万钧为弄清水杉种、属,多方筹措经费,或派人或亲往利川考察采集标本,为水杉的定名立下汗马功劳。胡先骕不但参与水杉定名,撰写水杉论文六篇,还不遗余力呼吁将水杉定为“国树”,甚至撰写《水杉歌》赞美水杉。古植物学家斯行健从1948年5月至1950年4月不到两年时间里,就水杉、水杉近缘植

物、活化石、孑遗植物等有关课题，发表文章达 14 篇之多。

与此同时，美国古生物学家钱耐先后五次驰函胡先骕，索取水杉种子及腊叶标本，并在美国“红杉保存委员会”的资助下，于 1948 年 2 月来利川考察水杉，考察结束后向行政院长胡适建议成立水杉保护机构。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院格雷塞特博士带领助手，也于 1948 年 7 月前往利川水杉分布区进行昆虫考察，采集动植物标本。

“物种使者”走向世界

水杉一经发现，国内外广泛引种栽培。在国内，北起沈阳，南至雷州半岛，东至东海、黄海之滨及台湾，西达陕西、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等大量引种。在国外，1946 年郑万钧将标本寄给哈佛大学亚洲植物专家麦雷尔，1947 年麦雷尔资助中国学者调查水杉生长分布状况和采集标本，随后将所获种籽分装 600 小包，免费寄赠欧洲、澳洲、亚洲、非洲以及北美和南美 76 座植物学研究机构、林业试验站和对水杉感兴趣的学者。一时，美国纽约植物园，英国爱丁堡植物园和皇家植物园（邱园），丹麦哥本哈根植物园，荷兰阿姆斯特丹植物园，日本京都大学演习林场等遍植水杉。尤其是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从 1946—1948 年先后六次从中国得到水杉标本及伴生树种和蕨类标本近 1300 号，是引种水杉最多的地方。

国内外科学界对水杉的“热情似火”，也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48 年 5 月，农林部、教育部、内政部及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组成“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并于 5 月 8 日在南京中央博物院举行第一次会议。



利川“水杉王”命名为 0001 号水杉模式标本树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进一步保护水杉，采取了更加有力的举措。1974 年，在利川水杉坝建立“水杉管理站”，经过 50 年的培育与发展，现已建立水杉种子园 100 多亩，拥有水杉原生母树 5746 株，其中树龄最长的一株达 600 年历史，最年轻的也有 100 多年历史。1981 年，水杉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988 年恩施州星斗山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水杉作为中国独有树种，一直受到邓小平、胡耀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厚爱。1961 年，胡先骕将《水杉歌》寄予陈毅副总理，他收到后立即邀请胡先骕作客中南海，并写作《〈水杉歌〉读后记》，二者刊载于 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5 年，胡耀邦专程来到水杉的故乡利川，深入水杉林区视察。1992 年 1 月 22 日，邓小平视察南方，游览深圳仙湖植物园时，对植物园负责人陈覃清说：“还有一种古代树

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邓小平指的就是利川“水杉王”，可见其深深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

水杉作为“植物国礼”和“物种使者”，搭起了中国与世界的友谊桥梁。1972年，中国将2公斤水杉种子赠送给朝鲜，表达中朝友好情谊。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把自己心爱的游艇命名为“水杉号”，以此纪念中美关系友好的开端。1980年，中美科学家把水杉称为“中美友谊之树”。1978年2月，邓小平访问尼泊尔送去两株水杉，与尼泊尔首相一道种在尼泊尔皇家植物园，称之“尼中友谊树”。

东湖绿道水杉亮眼

水杉大面积进入武汉，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的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水杉因树形秀丽、生命力顽强，受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城市的青睐，均将其作为风景园林树种大量引种。1974年，中国林业科学院和湖北省林业部门召开“水杉、池杉、落羽杉”协作推广会，为普及水杉育苗造林技术和取得繁殖材料提供场所和信息。

80年代以后，水杉种植在武汉达到高潮。全市公园、风景区及磨山环山公路均种植有水杉，“城市遮荫，农田挡风，滨湖建景，工业需要”都有其身影。“在农田之间，按200亩一个方阵种植水杉，作为挡风墙；农田林网种植水杉之外，还在城区行道上作为绿化树种种植，也种植了一些小的片林。”武汉水杉常于园林、水滨、道旁丛植、列植、



东湖湖心长堤水杉景观带远眺

孤植或片植，最集中的地方是谏家矶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旁的水杉林，多达8000株，已有40多年的树龄。此外，青山江滩、武钢职工宿舍区、武汉大学等高校校园，皆有小片水杉。

水杉是很好的观赏树种，每年冬春之际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武汉最美的水杉景观当属东湖，从50年代种下第一批杉树，此后遍地成林。70年代初修建沿湖路，两旁栽上了水杉树，如今已成参天大树。2016年东湖绿道开通，又移栽506株胸径17—18cm的水杉，与万株乔灌木一同勾勒出世界级绿道风光。2018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他们在烟波浩渺的东湖之畔散步，身后就是湖畔美丽的水杉林。

近几年，武汉围绕市树，着力讲好“水杉故事”。

2015年9月25日，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武汉开幕，主会场武汉园博园不仅大量种植水杉，还打造有“杉花溪”“杉杉湿地”“水杉博物馆”等独有景观，展现武汉与水杉相融相生的和谐画面。

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

汉举行，朝气蓬勃的赛会志愿者名为“小水杉”，彰显武汉城市精神，表达军人刚毅坚强、伟岸挺拔的特质。

2022年11月，《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武汉召开，武汉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称号，水杉作为湿地主角功不可没。今后，武汉还将与利川联手，把母本水杉移植武汉，组成水杉林、“水杉王”、冰川期“水杉化石”等系列景观，打造武汉“水杉谷”风景。同时，引进德国北光水杉、美国矮生盆栽水杉、英格兰碧羽近20个品种，栽种于四环线区域。市民足不出武汉，即可观赏世界水杉林风光。

江城梅花冠绝全球

梅花，我国的特产名花，有4000多年历史。花开五瓣，寓意五福，即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和善终。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有深厚的梅花情结，梅诗、梅文、梅画、梅曲比比皆是。南宋《群芳备祖》、明代《群芳谱》、清康熙钦定《广群芳谱》，更是推梅花为群花之首。1987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性传统名花评选中，梅花亦名列榜首。



东湖梅园近200株美人梅迎春绽放

湖北是梅花的故乡，秦汉已有野生梅花生长在长江湖北段两岸。南朝盛弘之《荆州记》所载“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述说的是诗人陆凯在荆州遇驿使，折梅附诗赠长安好友范晔的故事。唐肃宗至德三年（758年），李白因受永王李璘叛乱之牵连，被贬夜郎（今贵州）途经江夏（今武昌），与好友史钦畅游黄鹤楼，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千古名句。从此，武汉不仅拥有“江城”之别称，也表明自唐以来武汉一带梅花甚多。明清时期，黄鹤楼附近梅花丛植成林，卓刀泉寺庙周围暗香浮动，梅子山“其山多梅”，龟山有“梅岩”摩崖石刻，武昌洪山很多花农以卖梅花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梅花的种植规模在全国领先，并被广泛运用于园林绿化中。据市园林和林业局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有83座城市公园、景区种有梅花，其中50株以上规模的梅林有22片，梅树2.6万株。不仅如此，园林部门特别重视搜集梅花品种、建造特色梅园。解放初期，搜集本土品种数百株建“梅岭”。1955年从重庆引种1000株，1956年又引入开花大粉500株。

还从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引入数百株，在东湖磨山南麓建造梅园。1980年后，东湖梅园又先后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南京、上海、青岛等地及日本、美国引进一些品种。

磨山梅园由最初的40亩扩展到现今800亩，定植梅树2万株，并建立“中国梅花研究中心”“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中国梅文化馆”，武汉梅花冠绝全球。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梅花进入寻

常百姓家，磨山梅园专家煞费苦心培育梅花盆景，年年举办梅花盆景展览。所培育“奔鹿”等盆景，吸引了诸如著名画家张肇铭为之作画，就连文豪郭沫若也曾作诗称赞。

1956年创建的东湖梅园，为全国“四大梅园”之首，位于磨山景区南麓，三面临水，回环错落，周围劲松修竹掩映，好一幅自然天成的“岁寒三友图”。东湖梅园由古梅园、放鹤亭、梅友雕像、中国梅文化馆、梅花资源圃、一枝春馆、冷艳亭等景点构成。早春时节，梅园“红梅万树一齐开”之际，前来赏梅、咏梅、画梅、摄梅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尤其是古梅园中，那158株百岁高龄的古梅树与800高龄的“梅祖宗”，总是引得无数人围观驻足。站在梅园，近观红梅吐蕊、水鸥乘风，远眺磨山亭台点缀、山色青黛，大美风光尽收眼底。

在东湖，除了梅园还有梅岭和小梅岭。梅岭是东湖北岸临湖的一处高地，其上有大片梅树（蜡梅居多）。早春季节，梅花竞相开放，芳香扑鼻，故称“梅岭”。梅岭由梅岭一号、梅岭二号、梅岭三号建筑群组成，梅岭一号是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的住所。老人家对这座以“梅”命名的客舍情有独钟，每次来时总对身边人说：到武汉去，还住梅岭。小梅岭位于听涛景区，是东湖种植梅花最早的地方，它由“海光农圃”创始人周苍柏当年手植。

在武汉传统文化中，梅花早已不只是一种花卉，而是精神追求的一种象征。武汉人有赏梅之雅趣，每于立春后雨水前，黄鹤楼公园、沙湖公园、紫阳公园、中山公园及青山公园“梅山香雪”景区（种植50余个品种的400多株梅花）等赏梅佳处，随处可见踏雪寻梅之人。

梅花融入了武汉人的生活。过去洪山



东湖梅园800多年的古树“梅祖宗”

一带传有“瓶插梅花迎新春”的习俗，而今春节赏梅已成为市民新春出游的一种方式。2007年底，武昌白鹭街沿线两侧绿化带每隔10米，间种朱砂梅和江梅约80株，打造武汉首条“市花一条街”。后来，毗邻的公正路沿线，又种植美人梅近200株，被誉为“梅花大道”。武汉地铁2号线列车银色的车身上，闪现着艳丽醒目的“梅花红”。走进车厢，扶手、座椅栏杆等也都漆成了“梅花红”，让人仿佛置身于东湖梅园之中。

有人说：武汉人选梅花为市花，是借“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品格以自励。是的，没有比梅花更能代表武汉这座英雄城市了。

市树水杉、市花梅花是武汉的城市名片，象征着武汉人不畏艰难、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象征着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蒋彤云，武汉图书馆辅导部主任，馆员；杜宏英，武汉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十个经典故事（下）

◇ 胡照洲

周洪宇：上书温家宝总理

周洪宇，1958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教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武汉市政协常委、市民进副主委、江岸区副区长、市教育局副局长、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为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一、十二、十三届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主委，民进中央常委。

周洪宇向我讲了一段上书总理的故事。

那是2003年3月6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来湖北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周洪宇对总理说：“3月2日我应《中国教育报》邀请，写了一个人大代表的建议，请您指示。”总理接过周洪宇递上的报纸，



2007年3月，周洪宇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发言

微笑着说：“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

2006年3月，周洪宇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

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2007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建议》。

周洪宇从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宏伟目标，以及世界各国教育政策之比较研究，论述了2009—2010年实行全免费义务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2006至2010年逐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和逐年教育总支出详尽数据之比较研究，论证了2009—2010年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可行性。

这个以实事求是风格精心编制的数字模型，富有惊人的震撼力，符合国家义务教育政策总体设想。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2009年已经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政策，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免费新阶段。

同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核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周洪宇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位提出完全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决策的专家学者、民主党派领导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郭友中：为一部国家战略作出历史性贡献

郭友中，1934年出生，浙江嵊泗人，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教授、博士后导师。历任中科院数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科委主任、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盟主委等职。



郭友中

2000年5月9—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率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考察团来湖北武汉考察，并委托郭友中为项目负责人、钱伟长为总顾问，开展长江中游华中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

科技部确认该课题为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郭友中邀集北京、上海、武汉为主，以及中南地区86位一线科研工作者，拟就21个子课题；聘请12位院士和9位国内外经济学家，组成国际性顾问委员会，共同开展全方位研究工作。

2001年1月18日，《武汉大学学报》专辑发表《长江中游华中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编辑出版10卷本《凝眸中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第四板块》。

科技部评价：民盟的总报告和10卷本丛书，为中央决策做了基础性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2003、2005年，民盟中央向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三次会议，以《关于推进中部区

域创新发展的战略与政策》为题，先后提交党派提案和大会发言。

2005年5月，民盟中央和湖北省政府，在武汉共同主办“中部崛起战略论坛”，并再次考察论证。

7月1日，丁石孙、张梅颖联名写信，向总书记和总理汇报会议和考察情况，提出“中部崛起是我国在重要发展机遇期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宜在‘十一五’期间明显见效，形成亮点”等5条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请“十一五”规划起草组一并研究。温家宝总理批示：请起草组按锦涛同志意见办。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采用了民盟中央建议，提出“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党的二十大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2021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为确立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民盟中央和郭友中教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肖国金：提案入选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提案

肖国金，1928年出生，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9年12月，王曦、李崇淮、肖国金（右）参加“政协论坛”节目

湖北省政协专职副秘书长，第七、八届武汉市政协常委，第九届民建武汉市主委等职。

1993年5月，肖国金撰写的《努力将武汉建成为广大内地的国际大市场》提案和论文，提出著名的“圆心”——将武汉建成国际大市场理论，荣获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最高决策咨询一等奖。

1996年3月，肖国金执笔的联名提案《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邀请我做第一提案人，报送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其他提案人还有金斌统、许其贞、董光清、童君美、胡和颜。

6月，国家劳动部回复：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的建议案收悉。建议分析透彻，所提出的对策很有参考价值，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做好就业工作的责任感。

2019年11月，全国政协表彰70年来有影响力重要提案，《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入选其中。这是我等没有想到过的殊荣，可惜7名提案人已经走了4位，此足以告慰英灵！

全国政协提案委办公室的申会平同志告诉我：你们的提案做得很好，民以食为天，劳动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有影响力、穿透力。

依我说，70年提案浩如烟海，14万件提案中遴选100件脱颖而出，这是武汉市政协历年来善于运用提案、建议案，开展政协工作所取得的集体荣誉。

胡昌民：“做人民代表要有激情”

胡昌民（1941—2023年），湖南桃江人，历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十届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民革副主委兼秘书长，武汉市政协专职副秘书长、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武汉市政府参事等职。

在网上，众多媒体生动讲述了胡昌民为之发力的两个故事。一是“历史丰碑应有碑”，二是“中山公园不能无中山”。

1986年湖北省两会上，胡昌民第一次提出寻找在武汉会战中壮烈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墓。这一找就是20年，他接连三次在全省两会上提出此提案。2004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做出批示，要求此事有一个结果。

历经艰难曲折，2005年，终于在武昌石门峰陵园找到安葬区域，耸立起中国空军烈士墓碑。2012年，烈士墓被授予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3周年纪念日，全国首座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铜像，在武汉市中山公园胜利广场揭幕，结束了多年“中山公园无中山”的历史。

一天，胡昌民出示一张报纸复印件给我分享，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为“中山公园无中山”一文写的批示。

这篇文章是胡昌民发表的，他在文中呼吁“汉口中山公园作为纪念公园，应该有个主题标志，或恢复，或新建，可碑，可亭，亦可堂，真正做到中山公园有‘中山’，俾得公园名实相符。”其实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豆腐块，但俞正声注意到并作了批示。

胡昌民有一句名言：做人民代表要有激情，自己不能把自己当外人，我们都是党的人。

在长达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中，胡昌民鲜为人知的一件事是：1994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关于开发利用武汉市区内王家墩军用机场的建议》。该建言受到中央军委高度重视，为武汉市运用这块宝地建设中央商务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昌民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是湖北团的代表，他抓住倪志福参加湖北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之机，深情陈述了武汉人民的心愿，打动了倪志福副委员长。倪志福热忱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作了汇报。尔后，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同意王家墩机场迁建，4000亩土地交还武汉市使用。



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期间，倪志福参加湖北团讨论

1999年2月9日，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明确提出搬迁王家墩机场，建设辐射华中地区的博览、金融中心的规划目标。

2003年1月5日，李宪生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王家墩机场原址“积极推进王家墩商务区建设”。

时至今日，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建设已经气势恢弘，标志性建筑耸入云天。胡昌民为武汉市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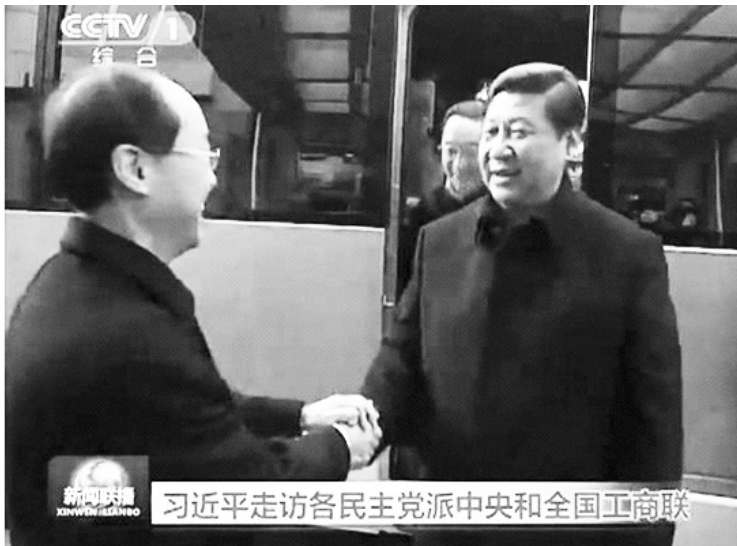
万鄂湘、辜胜阻：从湖北武汉走上副国级岗位

万鄂湘，1956年出生，湖北公安人，民革成员，武汉大学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辜胜阻，1956年出生，湖北武汉人，民革成员，武汉大学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社会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人口研究所所长，民建武汉市主委、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万鄂湘、辜胜阻二位，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时代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是建国以来从武汉市、湖北省走出去的两位副国级领导人。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刘延东到武汉看望老同志，接见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



2012年12月，习近平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同万鄂湘（左）亲切握手

市委书记钱运录，我和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作陪。

刘延东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主管省部级、副国级党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钱运录和刘延东是老同事老朋友，说话都很亲切知心。运录同志说，希望中央统战部能够多用几个湖北、武汉的党外干部。延东同志说，关键是人，你们要给我们多推荐几个人。

这次聚会给我印象很深。政者正也，久远而不能忘记。我知道，在市委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长心里，是多么惦念党外干部。

那还是在1996年，时任武汉市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李岩，听取关于实职安排工作汇报后，明确指出：“在我们党领导下，精心做好实职安排工作。”并且要求市委统战部联系武汉大学，物色一位懂国际法的年轻教授到法院工作，强调改革开放需要这样的人。

我到武汉大学向党委书记任心廉汇报，心廉同志郑重地推荐万鄂湘。不过他提出一个要求，万鄂湘人事关系仍然留在武大。我

说可以，武汉大学是万鄂湘的根。

武汉市委、湖北省委统战部都同意这个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完成了任命程序。就这样，万鄂湘脱颖而出，磨砺前行，融专业优势、年轻优势、党派优势于一体，从武汉市起步，走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领导岗位。

再说辜胜阻。崇淮老精心设计武汉市民建领导班子三线建设，告诉我和周启新同志。同时，我从美璐部长那里，知道辜胜阻是中央统战部掌管的后备干部。蒙部长说，我们省里都无权安排。

1996年，辜胜阻去哈佛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前，我们交流了几句话，对他印象十分深切。辜说，我了解美国的民主自由那一套，可以理直气壮地应对他们。

辜能说这番话，我是很高兴的。我懂得辜的意思，内涵是表达爱党爱国的政治情缘。我嘱咐辜，同中央统战部保持密切联系，有什么事联系我。

1997年7月，辜胜阻完成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任务后，给我带来一个信息：刘延东部长的意见是从基层做起。这句话，激活了我心中炽热的憧憬。

我向延东同志报告说，“从武汉做起吧，武汉是北京的一个大基层。”

中央统战部表示，赞成武汉市委善于运用党外领导干部的思路。

我向蒙美璐部长报告，美璐部长说：“这样好，市里先用，省里后用。”省市联动的大盘子就这样敲定了。

在中央统战部以及省、市委领导支持下，我和蒙部长参与了万、辜二位任职法定程序的基础性工作。

2000年4月，万鄂湘去北京任职前，主管政法工作的武汉市委副书记程康彦，在

武汉会议中心为万鄂湘送行，让我作陪。其间，我向万鄂湘提了3条建议：第一不要改变身份，民主党派是最宝贵的身份；第二要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不能马虎；第三帮武汉中院带的研究生要带完，不好半途而废。

我记得，万鄂湘动情地讲了一段话，说自己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离不开武汉大学的培养教育，离不开武汉市的选拔重用。康彦书记说，离不开你自己的艰苦奋斗，这一条至关重要。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万鄂湘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时年44岁，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二级大法官，分管民事审判四庭，有关涉外、涉港澳台的经济、贸易、海事、海商案件等都归口民四庭管辖。

2003年3月7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举行中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记者招待会，万鄂湘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民革中



辜胜阻

央副主席身份，就如何发挥民主党派参政作用答记者问。他说：“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5位在最高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凡是我分管范围内宪法法律赋予我的职权，我都能够拍板定案。最高法院的所有会议，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办公会，及重大的人事任免我都必须参加，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花瓶。”

万鄂湘批驳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攻击和歪曲，赞誉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真实性和优越性。

2006年2月，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为辜胜阻建言议政专著《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探索》写序指出，辜胜阻的建言立论富有基础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战略性、建设性和超前性5个特点。胡德平说，辜胜阻“为党和国家积极建言献策的精神值得我们统一战线的同志们学习”。

武汉大学举行该书首发式，邀请我到会。我在发言中说，感觉最有影响力的是《合理引导我国‘民工潮’的建议》。

这是1994年3月，辜胜阻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的大会口头发言和所交提案。辜胜阻说，从改革开放意义上讲，人口流动是一个大学校，是社会发展的进步而不是倒退。他提出了关于城镇化建设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性建议。

辜胜阻告诉我，这篇大会发言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交办的课题。

八届一次会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要求民建中央的同志研究一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民建中央委员、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辜胜阻。

尔后，党和国家采纳了民建中央和辜

胜阻的建议。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高度。

当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辜胜阻的演讲，感觉脑洞大开。我认为，辜胜阻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位为农民工鼓与呼的专家教授，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显著优势。

辜胜阻出任副市长时，我和周启新副部长去他家看望，知道辜的夫人李珍是共产党员；辜的学术团队很强大，每年要做一些国家重点课题。我建议辜：“要继续做好这件事情，这是你的根，民主党派的同志很看重这一点。”

2018年暑期，辜胜阻携夫人回到武汉度假，看望老同事老朋友，约我到东湖宾馆小聚。他告诉我，习近平总书记与他进行了任职谈话，令他感奋激发，总书记对党外领导干部关怀至臻、期望至臻。

2021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召开后，我给辜胜阻同志发了一条短信，对他在开幕会上作提案工作报告表示祝贺。

胡照洲，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市委统战部原部长

“步上西山寻野梅”

——诗文中的苏东坡与鄂州（中）

◇ 夏建国

首游西山：追寻元结隐耕逸迹

苏东坡戴罪贬谪黄州时，尚未完全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因此他不得不在此地作长远打算。麻城岐亭的老友陈慥此前来信，建议他在武昌买田养老，这成为其迫切期待过江探考的重要缘由。恰恰在首游西山时，唐代元结在武昌退谷的隐耕逸迹给苦闷中寻求出路的他带来一丝光亮。苏东坡在《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里表示“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所须修竹林，深处安井臼”。

原来，元结隐居武昌时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不久，战争使得大片良田荒芜。元结《故城东》以“漫惜故城东，良田野草生。

说身县大夫，大夫劝我耕。耕者我为先，耕者相次焉。谁爱故城东，今为近郭田。”记下其所作所为。元结不仅身体力行地躬耕武昌“故城东”，还带领乡亲垦荒江北“西阳城”（唐之前黄州曾为西阳州）。对此，苏东坡在首次探访西山所写诗中，给予其“尔来风流人，惟有漫郎叟（指元结）”评价。

苏东坡对元结的评价实际上是基于自身有感而发，自己戴罪贬谪此地，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官，未来将何去何从？俸禄锐减、又无积银，如何让家人衣食无忧？元结隐耕武昌时的经历，不正好给出了参考吗？

苏东坡所说的“买田吾已决”，极有可能是在陈慥建议、元结启发两方面影响下



唐代元结隐居垦耕的武昌西山退谷环湖

所做作出的初步决定。尽管最终因为地跨两路的顾忌，使他放弃这一想法，但如同元结“耕彼故城东”那样，后来苏东坡又躬耕黄州古城东坡。如此说来，其自号的“东坡居士”，既有白居易在忠州“东坡桃李种新成”的深刻烙印，又有元结在武昌“耕彼故城东”的明显影响。

重修九曲：《武昌九曲亭记》

苏东坡和武昌倾情结缘的诸多表现之一，就是对事关武昌民生的大事、难事、雅事忧乐与共。到黄州不久后，他从车湖“二王”侄子王天麟口中得知鄂黄一带有“溺婴”恶俗，便一方面通过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区）知州、好友朱寿昌来布局遏制，一方面在黄州带头捐款，组织民间力量展开拯救行动。此后，苏东坡对一件事关古武昌文脉传承的事情又极其关注。

东坡第一次登临西山时就发现九曲亭因年久失修而倾废，在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诗中以“西上九曲亭，众山皆培塿”，点明其在西山胜景中的重要地位。陪苏辙游览西山时，弟弟所赋诗里“仗策看万松，流汗升九曲”诗句，也似乎提醒着他九曲亭的重要性。九曲亭不仅是武昌人珍爱的孙吴遗迹，而且还是所有登临西山的游人和礼佛还愿香客们的重要休憩地，从九曲回肠般的步行小道上山，爬到半山腰的九曲亭前，没有人不汗流浹背。

虽然身处困顿窘境之中，但苏东坡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重新修缮九曲亭之事。躬耕东坡后，苏东坡一家人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他便开始琢磨如何修复扩建此亭。这时一个机遇不期而至，元丰五年（1082）五月的一天，狂风暴雨袭来，九曲亭旁好些大树被刮倒。苏东坡带着友人赶上山，发现坏事变成了好事，被刮倒的大松树可直接作为建亭材料，清除倒树后的空地又为扩建古亭提供了场所，大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很快，一座崭新阔达的九曲亭重新屹立在“孙氏遗迹”之上。



鄂州市西山九曲亭

苏辙很快写来《武昌九曲亭记》祝贺，起笔就从哥哥来黄州后的实际生活经历及其情感变化，细致入微地分析其爱上武昌、挂念九曲废亭的过程和缘由，叙述哥哥和朋友“相与营之”“亭得以广”的经过。接着苏辙围绕哥哥为何亭成“于是最乐”、其“有乐于是”的秘诀何在这两个问题，由表及里地进行探析。

正因为此记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写出了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写出了苏东坡贬谪黄州、扁舟武昌期间情感变化和精神追求的真知灼见，所以成为千古散文名篇，后来被镌刻在九曲亭正中壁板上。“二苏”珠联璧合的此亭此记，以厚重人文色彩和可观可诵丰富内涵，成为中国古代亭台楼阁文化长廊的绝配。

畅游西山：携友吟对赋诗

九曲亭修复扩建后的七月，苏东坡又与朋友畅游西山。这次他请来车湖“二王”中的大哥王齐雄等同游。在《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并引》中，首先对此行作风趣描述：“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题一句云：玄鸿横号黄榭岬。九曲亭即吴王岬山，一山皆榭叶，其旁即元结陂湖也，荷花极盛。因为对云：皓鹤下浴红荷湖。坐客皆笑，同请赋此诗。”从诗引描述的这次出游情形看，苏东坡实际上做了两件难中有趣的吟对、赋诗雅事。

其缘由是九曲亭上的一楹联上句“玄鸿横号黄榭岬”，因特殊答对要求，要对好下句，要过三道难关。一是必须按上联所用“吃语”来吟对。上联七字中间五字为同一声母，首尾二字是另外一个声母，读起来诘屈聱牙，被称为“吃语”。二是必须同吟上

联所述西山景物。三是联中每字必须跟上联“玄（颜色）鸿（飞禽）横（方位）号（行为）黄（颜色）榭（植物）岬（物体）”的特定含义相对应。凡此种种，没有超乎寻常的语言技巧、诗词楹联写作基础、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是对不出规范贴切下联的。

偏偏苏东坡是个勇于挑战的人，他想起元结《攄湖铭并序》中“攄湖东抵攄樽，西侵退谷，北汇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的描述，便吟出下联“皓鹤下浴红荷湖”，不仅前后五字与所对上联中间五字声母完全相同，而且联字特定含义与上联一一对应，所吟景物出自九曲亭旁的攄湖。大家当即被其惊人吟对水平所折服。

为了满足“同请赋此诗”愿望，苏东坡又缘用“口吃难言”的双声叠韵戏谑方式口占一诗，虽然吟诵时拗碍口舌，但品味起来妙不可言。其开篇“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诗句，透出自己于坎坷窘境中“犍耕躬稼”黄州古城东坡、“击剑赓歌”武昌大江两岸的情趣与追求。《冷斋诗话》《漫叟诗话》均认为，此诗可能是最早的七言口吃诗。

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像这样携友游乐武昌的活动还有无数次，其间有吟诗答对，有题壁作记，有故友新交汇聚，有雅事乐事相随。这些活动帮助他在贬谪磨难中调适了心绪，也为其实实现“黄州突围”注入了精神力量。

融汇佛道：存平常清净之心

苏东坡为何时复扁舟古武昌？苏辙的《武昌九曲亭记》说出了部分奥秘，认为哥哥“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便“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就是冲着武昌的名山、

名寺、名观而去的。这期间蕴含着历史文化背景，一是眉山和武昌对佛道在长江流域的传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苏东坡自幼受佛道思想的熏陶。

岷江边的眉山，上下游连着道教、佛教两座名山——青城山、峨眉山。因此，苏东坡从小就处在浓厚的佛道氛围中，这为其与佛道根基同样深厚的武昌结缘留下历史契机。因为武昌是江南佛道重镇，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南传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今南京）”之说，西山还是慧远创立净土宗的发祥地之一，从三国到南北朝，武昌对江南神仙道教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道家“小仙翁”葛洪在此结庐炼丹、弘道著述。也因此，苏东坡通过过江接触了解，对“应劫而生，融汇儒道”的净土佛法起源产生了浓厚兴趣。

来黄八个月时，苏东坡陪同友人李常游西山、探菩萨泉，写出《菩萨泉铭并叙》，道出对武昌西山寺佛事的感悟。这篇铭和叙记述的文殊菩萨金像神奇灵异传说故事，正是慧远从武昌西山起步发祥净土宗，再到庐山东林寺形成传播净土宗的文学艺术化呈现，还是西山菩萨泉命名解读与古灵泉寺名的源头。

随着对净土宗义理膜拜感悟的日渐加深，帮助东坡居士在修身养性和文学艺术创作上打开了新天地。元丰四年（1081）三月他陪弟子王子立到西山寺品泉食饼后，随口而成的《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就是集中体现。

其中带着浓浓佛理的压轴诗句“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由菩萨泉想到与其相关联的文殊菩萨金像，又进一步联想到佛教《楞严经》所载“月光童子修习水观”等情形，巧妙地点化佛经故事入诗，

突出其佛理释意。诗中“同”字表明，清静之心的获得不仅自己能够做到，王子立同样也可以做到，以此暗示回家乡赶考的弟子，要以平常清静之心去对待，充分表现了他对晚辈的真切关爱和期冀。因此，该诗成为苏东坡在黄期间所写“佛理诗”的代表作。

后来，苏东坡和王子立西山寺所食之饼被命名为“东坡饼”，成为江南名点。

武昌寒溪：“禽言诗”中的悯农情

三国史笮纂修的《武昌记》载：“樊山东有小溪，夏时怀袖，但有寒气，故谓之寒溪。”首游武昌西山后，苏东坡曾为当地以“脱却破裤”作为布谷鸟催耕所鸣之声的谐音而不解，反复琢磨也不得要领。但一次武昌寒溪的耳闻亲见，让他不仅得到生动形象诠释，而且刻骨铭心、深情赋诗。

一天，苏东坡再次过江到西山。刚踏入寒溪，遇一农夫连裤腿也未卷起来，就从溪水中蹚了过去，甚是诧异。这时，旁边山林里传来一阵阵“布谷！布谷！”鸣叫声。这位农夫立即吼骂起来：“该死的瘟鸟，你也叫‘脱却破裤’呀！”

苏东坡顿感奇怪，连忙上前问农夫：“老乡，你卷起裤子蹚水，不就免得打湿衣服了吗？”犹豫了一会，这位农夫当着他的面脱下裤子。苏公只见农夫臀部和大腿上到处伤痕累累，便问何故？农夫流着泪说：“因欠了东家租子，早上送了一担谷去还不够交租，东家发了脾气，我争执几句，就被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苏东坡方才明白这位农夫为何不卷裤子蹚水走，原来是怕冷水直接刺痛伤口，当然也有不想让人见到“催租瘢”的意思。

回到黄州后，苏东坡就寒溪所见所闻

情景，写出《五禽言五首》其二：“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裤。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南山”实为黄州江之南的西山，“西溪”就是武昌城之西的寒溪，诗中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裤’”。

这首以禽鸣之谐音假定为人语，表诗中之意的“禽言诗”，饱含对武昌农人的怜悯之心。不仅让人对不挽裤腿蹚水、身有“催租瘢”农人感到深深同情，也让人对苏东坡这位知农、恤农、悯农的“识字耕田夫”肃然起敬！

横空出世：《念奴娇·赤壁怀古》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认为，苏东坡贬黄期间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异乎寻常”。

“大江、大湖、名山、名城”自然交汇在一起，这是古武昌山川地理的绝妙之处。不幸处在戴罪贬谪境况中的苏东坡，恰恰在居住的临皋亭里，在“时复扁舟”过程中，对此地山川地理一览无余。这为其缓解苦闷困顿心情，开拓豁达豪放心境，激发文学艺术创作灵感，实现“黄州突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横空出世，就是例证。

大江在两湖平原间汇聚成云梦泽，浩阔的古樊湖（今梁子湖流域）原本是古云梦泽东南端的一部分，宋代大诗人陆游所写《武昌感事》诗，就有“烟雨凄迷云梦泽，山川萧瑟武昌宫”的诗句。因此苏东坡在《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中这样概括黄州、武昌地理位置：“云梦（泽）南州，武昌

东岸（指黄州之东）”。正是因为长江在武昌樊口、黄州赤壁一带跟古樊湖相拥，所以在此形成“与海相若”的震撼场面。

大自然鬼斧神工般地将大江、大湖、名山安排在黄州、武昌这两座名城之间相交相会，并迎来苏东坡在此疗伤舔血、蛰伏蝶变，让他得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东坡来到赤壁与樊口之间的大江，他中流观江天，俯仰瞰古今，吟出《念奴娇·赤壁怀古》。

仔细品读这首词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绝句，以及此词赖以起兴的赤壁战事和“公瑾（周瑜字）当年”率孙刘联军从樊口出征史实，便可知武昌、黄州之间所形成的绝妙独特胜景，在苏东坡心中产生的巨大创作激情，应该是这一笑傲古今杰作诞生的缘由之一。

苏东坡从纵横天地、窥视历史的角度，引发出对人生的感慨，以及对古与今、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这实际上是其从贬谪失意困顿心境中解脱出来，开始转向逆境升华的宣示。

夏建国，鄂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鄂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做武汉“红楼”的守护者

◇ 魏德勋（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魏德勋，市政协委员，辛亥革命博物院（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院长、党委书记

说到红楼，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但其实在我们武汉，也有着一栋特殊的红楼，它就是武汉的地标建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原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其外观庄重典雅，由红墙红瓦砌筑而成，武汉人习惯以“红楼”称之。

从2015年被任命为武汉红楼馆长以来，我始终承担着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这座重要历史建筑的职责，重任千钧，使命如磐。在当选市政协委员后，我深感责任更重大，使命更光荣，秉持着“为民代言、为国献策”的信念，结合本职工作文物保护、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为武汉英雄城市文脉传承积极建言献策。

走进“红楼”，读懂武汉精神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文化文物部门工作，最开始是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后来调任到省文物总店（后改名为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2015年9月份，我被组织任命为红楼的党委书记，2017年1月开始党委书记和馆长“一肩挑”。

2022年5月，武汉市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与辛亥革命博物馆合并，组成现在的辛亥革命博物院，红楼为博物院北区，原辛亥革命博物馆为南区。在红楼工作近十年，虽然我的职位和管理范围有所变动，但始终不变的是对这方建筑的热爱与探索，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真正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这座重要历史建筑。

红楼的主体建筑是原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旧址承载着首义精神，是博物院设立、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做好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才能让革命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传开来。因此，在工作中我始终践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要求，将旧址保护放在第一位。

2021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我牵头负责组建工作专班，组织对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主楼修缮工程，重点进行了门廊加固以及屋面、墙柱面、地面、天棚、门窗的全面维修。旧址门廊加固工程质量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为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我每天早晨七点左右就到达施工现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和步骤，组织设计、施工和监理各方人员共同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最后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及国家文物局考评专家组的检查，解决了多年来旧址地基沉降和主楼门廊倾斜的安全隐患，使年逾百岁的旧址主楼又重新焕发活力。

其次便是利用好辛亥革命博物院的资源。博物馆及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应主动担当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2022年我院重点推出两个展览：

一个是“辉煌十年 荆楚答卷”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五次视察湖北的殷殷嘱托为指引，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圆梦小康、绿水青山、幸福生活、英雄湖北六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湖北人民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反映了新时代荆楚大地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性变化。

另一个展览是“文物藏品中的英雄武汉”，从首义之城、革命潮头、抗战中心、换了人间、改革高地、决胜之地六个部分，突出反映武汉英雄城市从辛亥革命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武汉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作出

的历史贡献，回答了武汉何以称为英雄城市的人民之间。

其三就是要传承好首义文化。红楼不仅是武汉著名的地理标识和城市名片，也是武汉人民重要的精神家园。武昌首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早已浸润在武汉这座城市发展的血脉之中，对现在“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近代大革命中心和全国抗战中心，到建国初期武钢、长江第一桥的建成，到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洋厂长格里希，再到现代的抗洪抗疫，武汉这座城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表现出敢作敢为、开拓进取的豪迈气概。但“敢为人先”这一城市精神，武汉有，湖南有，江苏有，上海有，浙江也有，大家都在敢为人先，那我们武汉的“敢为人先”和其他城市有何明显区别呢？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理解和表述辛亥首义精神。我认为辛亥首义精神除了“敢为天下先”这种颇具荆楚文化特色的外在英雄气概外，还应该有一个内在的、融在血脉之中的精神内核，这就是湖北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号召下，以民族复兴大义为己任，主动作为、不怕牺牲的勇敢担当精神。因此，我把辛亥首义精神概括为“勇担民族义、敢为天下先”，强调武汉的“敢为人先”是为了民族振兴，是以民族大义为出发点。

情牵“红楼”，增进两岸交流

在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后，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就成了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产床，武汉以“首义之区”名垂青史，红楼以“民国之门”闻名天下。辛亥革命博物院在

海内外的重大影响力，赋予了我们特殊的时代使命，作为武汉首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我们一直是促进鄂港澳、鄂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2023年10月，我去延安参加全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论坛。论坛系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规格很高。在这个会议上，我做了主旨发言，主题就是博物馆的发展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我们辛亥革命博物院如何推进海峡两岸交流，加强两岸青少年互动，让台湾的孩子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让他们认可自己的根还在大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表扬我的发言有见地、有特色。还有许多参会的全国各地革命纪念馆馆长，要我把PPT发给他们观摩学习，说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我对他们说，每个博物馆的特点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辛亥革命博物院存在这样的特殊性，所以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两岸交流这一块，要努力为两岸交流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近年来，我院一直在积极举办两岸的学术交流会议，开展两岸青少年研学等活动，让台湾青少年近距离、深层次、多角度感受武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不断强化两岸青少年和海内外中华儿女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理想认同。去年7月，第七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随手拍”活动开营仪式在我院举办，有60多名两岸青年深度参与。

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去年3月，马英九先生将辛亥革命博物院定为武汉之行的第一站，我们配合相关部门对马先生一行进行热情接待。当天，马英九在旧址主楼大礼堂现场考问与之随行的大九学堂青



2023年3月接待中国国民党原主席马英九先生一行

年学生对于五色旗和十八星旗的了解。模仿孙中山先生1912年4月12日访问鄂军都督府时演讲的情形，站在讲台前，举起右手，高呼“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在参观最后一个展厅播放孙中山演讲原音的地方，马英九认真聆听，驻足了5—6分钟，若有所思。

我一直致力把我院作为海峡两岸交流的纽带，发挥博物馆的统战作用，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份力量。台湾两千万民众，能够多吸引一个人认同一个中国，愿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我们博物馆的贡献。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朋友多来大陆、多来武汉，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至少通过这些活动，台湾青少年能够有机会了解大陆，认可大陆，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

立足“红楼”，积极建言献策

2022年，我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努力找寻本职工作与委员履职的结合点，发挥单位阵地优势和个人专业优势。身为辛

亥革命博物院的院长，我一直在为武汉建设“博物馆之城”鼓与呼；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界别委员和文化工作者，我结合自身在文物保护、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为武汉英雄城市文脉传承积极建言献策。

两年多来，我参加市政协相关活动二十余次，克服本职工作繁重的客观困难，投身并下沉居住地和工作联系地社区，深入一线了解社区群众所需，提供展览、讲座和时政宣传等文化生活产品，解决停车棚建设、困难群众走访慰问等现实问题，参与社区建设和环境治理等活动。

我早先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工作时，与地方戏剧院的艺术家们多有来往和交流，了解到汉剧对京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汉剧有许多有价值的服装、道具，包括名家用品等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收藏存放，很多已经遗失了，专门成立一个戏曲博物馆以展现汉剧、楚剧等地方戏剧历史，时不我待。

因此，在获知我市为繁荣文化艺术、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高标准建设武汉戏曲艺术中心时，我备感喜悦，在市政协召开的对口协商会上作了《武汉戏曲艺术中心建设意见》口头发言，认为在建设武汉戏曲中心的同时，应该考虑一并建设武汉戏曲艺术博物馆。该建议得到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肯定，已纳入武汉戏曲艺术中心的建设方案。

同时，我也积极为武汉城市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如针对武汉积极筹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我提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示范区建设应突出武汉革命文化资源优势》等多项建议。针对“武鄂黄黄”武汉都市圈建设，我也提出建议，认为不仅要关注怎么把都市圈的经济、科技、教育等进行联动，也

要聚合与共享文化旅游资源，促进都市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关于助力武汉英雄城市文脉传承，其实我有一些更宏大更遥远的想法。中国现有56处世界遗产，现在武汉“万里茶道”申遗正在进行中，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辛亥革命博物院能为武汉申报世界遗产贡献一份力量。如采取“万里茶道”申遗的方式，把武汉辛亥革命文化遗产如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起义门等，与新加坡的晚晴园，日本神户，中国台湾、香港、南京、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海内外孙中山纪念地的文化遗产联合起来一起申遗，这样既有合力，又能借助这个纽带加强国内外的文化交流。

我深知申遗是一件复杂且艰难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但如果我们不走出第一步，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申报世界遗产的第一步是要纳入到国家的预备名录，国家再从中挑选最成熟、最核心、最有竞争力的项目进行申报。

因此，我经常和年轻的职工同志交流，要求他们多查阅一些资料，多和一些专家学者研讨，积极准备，先争取早日进入到国家预备名录里。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争取政府部门两年内正式提出这个目标，努力准备4—5年开始正式申报，再用4—5年的时间进入国家预备名录里，最后用8—10年时间把它搞成了，哪怕历时20年，那也是完全值得的。

躬逢盛世，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与势；万里路遥，这是赋予我们的担与责。作为武汉红楼的“守护者”，作为市政协委员中的一员，我定当坚持守正创新、交流互鉴，充分挖掘和发挥首义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努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争做汽车电子业的领跑者

◇ 郑海法（口述） 高爱民（整理）

人物名片：郑海法，云梦人，湖北开特汽车电子电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工商联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兼职副会长，武汉市校友经济促进会法人代表、党支部书记兼副会长。

“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鲁迅先生的这句经典名言，反过来理解，就是不安逸的生活更能激发人的斗志。我就是个被不安逸的生活逼出来的企业家。

我在国企干了七八年，却始终住在10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29岁辞职下海时，一穷二白，身无分文，我用借来的设备，制造出一流的产品，推动国产替代加速……我的人生，是被困境与尴尬一步步地推动着前行。即便如今我已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坐拥过亿的财富，但我仍时刻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因为我深谙市场经济“不进则退”的残酷法则，并在同行你追我赶的氛围中，顽强前行。

“两室一厅”逼我下海

我1965年出生于湖北云梦。1987年，我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怀揣着梦想，来到了省会城市武汉，在一家国营厂当了一名技术员。

科班出身的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恰逢厂里正在开发一种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这款产品当时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开关电源上，其相关技术信息，只在国外的一些资料上有报道。我凭借着这些资料，和同事们昼夜技术攻关，最终研发成功。

作为一名青年技术员，我的事迹，引起了武汉市媒体的广泛关注。《电子报》《青年人报》和《长江日报》，对我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一时间，我成为青年们学习的榜样。

这样一个在别人看来技术过硬、前途光明的技术员，29岁了，早该是结婚生子

的年龄，可我仍然单身，仍然挤在 10 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每当与同学们聚会时，看到同学们相继结婚生子，在分到的福利房里过着幸福生活，我的内心开始有了一种失落。于是我向单位领导诉求和申请一套基本的二室一厅的住房，当时尚未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房子得靠单位分配，有钱也买不到，何况我也没钱，申诉多次无果，所以，我毅然辞职下海了。

那一年，是 1995 年。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不久，一如朱自清的散文《春》所描绘的那样：“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我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尽管当时我身无分文，却斗志昂扬。

与传感器结缘

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遨游，需要能力，更需要资金。前者，我有；后者，我没有。

既然已经到了海里，就算淹死，也得游下去。于是，我鼓足勇气，找亲朋好友借钱，开始做与传感器等电子产品相关的贸易。

技术，在关键的时候能发挥关键的作用。技术出身的我，不仅能够将自己经营的产品原理、应用、优势分析得头头是道，还能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售后保障，这是与其他非技术出身老板的明显区别，也是我的最大优势。一年下来，我赚了 2 万元，28 年前的 2 万元，可是一笔巨款啊！

做贸易不是我的初衷，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才是我的目标。那个时候，注册公司的门槛不高，我用自己的第一桶金，在 1996 年 10 月，注册了我人生的第一家



2011 年 4 月，法雷奥执行器全球协调员来访

公司——湖北开特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开特股份的前称）。

创业之初的艰难，超出想像。公司没有办公桌，就去旧货市场买别人淘汰下来的办公桌椅，5 元钱一张，买不起 2 万元一台的关键设备——半导体切割机，得知武汉大学有，我就三番五次地到武汉大学求助，最终以 60 元的租金，租得了这台设备一个月的使用期限。就是这样精打细算，让公司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在业界慢慢站稳了脚跟。

不久，一个巨大的机会来临了——国家要求合资汽车公司尽早实现零部件国产化。当时神龙汽车公司刚刚落户武汉，每台汽车上都有多种温度传感器，用量非常大。而在当时，国内没有比开特公司更成熟的技术和产品。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开特公司的产品便成了唯一选择，从此开特进入汽车零部件领域，因此成就了我的梦想。

传感器，在汽车电子系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控制器、执行器一起构成了汽车电子系统，汽车如果没有了传感器和电子系统，就无法做到正常运行。我们熟知



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左二）到开特调研



时任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到开特调研

的汽车空调就是通过由各种传感器、电子控制器和执行器组成的电子控制系统来实现制冷、加热、通风循环。

开特公司为神龙公司成功配套后，产品不断拓展，从单一的温度传感器，拓展到光传感器、直流电机执行器、步进电机执行器、无刷电机执行器、电机控制模块等。除此之外，公司成长为一家集塑料模具的设计、生产和塑料零件的生产，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电子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机电一体化设计，产品的验证和独立的环境可靠性实验于一体的公司。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负压救护车供不应求，开特股份接连收到江铃、依维柯、长安等车企的零部件供货请求。负压救护车的送风系统相当于给车子戴上了口罩，没有我们生产的空调执行器、传感器，救护车就下不了线。

登陆北交所

经营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不断的技术与产品创新公司才能活下来。公司现已拥有 321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5 项，这为开特股份构筑了护城河。截至

2022 年末，公司拥有技术人员 151 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为 18.35%，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同类企业。

为适应公司的不断发展，公司已经逐步形成一家先后拥有武汉、云梦两个生产基地，武汉、苏州两个研发中心，奥泽、海特等五个子公司的集团化股份制公司。同时，公司与多所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保持紧密合作，特别是与清华大学汽车研究院形成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掌握着汽车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方向。

此前曾有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考察开特股份，得知开特股份在为全球第二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电装公司配套，感到非常意外，因为电装公司对配套企业要求非常高。

事实上，从 1996 年开特股份在武汉成立之日起，就伴随着顶级高手一同成长。公司第一个合作对象是世界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国法雷奥集团，为其配套生产温度传感器，当时国内还没有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凭借为世界级大公司配套的“金字招牌”，开特股份打开了更多和外资企业合作的大门。他们敢于把这些项目交给我们，是对我们实力的认可，也验证了我们路径的正确。

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除了深耕产品外，开特也在不断地加大节能、环保、智能产品的开发投入，从单一功能产品向系统产品高度集成，积极配套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网联汽车等的产品开发。

目前，开特股份服务客户超过 200 家，包括比亚迪、上汽集团、广汽集团、中国一汽等汽车整车厂，小鹏、高合等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广州电装、法雷奥集团、松芝股份等国内外知名汽车热系统厂商。

开特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湖北省自主创新产品、湖北省科技进步等荣誉；获得与德国大众公司同步开发阳光传感器的资格；获得 VALEO(法雷奥)全球温度传感器设计供应商资格。是工信部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认定的“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科技小巨人”企业。

我个人也获得了很多荣誉。2004 年当选为武昌区政协委员；2007 年获武汉市第五届十大杰出创业家；2010 年当选湖北省经济建设领军人物；2010 年当选武汉城市圈十大高科技品牌领袖；2013 年当选湖北省科技创业企业家；2017 年当选武汉市人大代表，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等等。

2015 年 7 月，开特在新三板挂牌；2016 年 5 月，开特股份成功进入新三板创新层；2023 年 9 月 28 日，开特股份成功登陆北交所，成为湖北第 142 家 A 股上市公司，在波澜壮阔的资本市场，开特股份开启了新的篇章！



2023 年 9 月 28 日，开特股份北交所上市敲钟仪式

“持续改进，永无止境”，这是公司大门口的八个大字，我希望用这句话时刻提醒自己及所有员工。以“向客户提供零缺陷的产品”为质量目标，以“技术专业化、组织集团化、管理信息化、品牌国际化”为发展战略，实现“为员工营造发展空间，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制造优质产品，为股东提供回报”的经营宗旨，力争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最优秀的零部件供应商和知名品牌。

依托于中国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下游行业需求回暖，2023 年上半年，开特股份营收成绩喜人，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公司第一大客户比亚迪汽车整车产量大幅增长也带动了公司产品销量增长。

中国百年企业非常少，我感觉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会出现一批执着的企业，在一个个小领域做成世界级，最终聚合成为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坚信马列志不移”

——董必武早期思想的转变之路（下）

◇ 田子渝

创建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参加中国共产党，表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将自己的命运同共产主义与振兴中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启了他辉煌壮丽的人生。

第一，创建中共湖北早期组织。

1920年春，陈独秀来到湖北，在文华大学和武昌高师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与董必武、恽代英（1895—1931）、包惠僧（1894—1979）等激进青年接触，特别是结识了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1888—1966），组织他们调查武汉的工人情况，后

在《新青年》上发表《汉口苦力状况》《武汉五局工人状况》等文。10月，陈独秀、李汉俊派党员刘伯垂（1887—1936）回到武汉，与董必武联系，发展包惠僧、陈潭秋、郑凯卿、张国恩、赵子健（1895—1950）等5人入党，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董必武、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举行会议，宣布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与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同月诞生。

武汉早期党组织在多公祠5号设立秘密机关，对外为刘伯垂律师事务所，以作掩护。同时决定将恽代英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作为党的刊物，使这份最初宣传新文化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杂志转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

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立即展开活动。

首先，进行党组织建设。党组织先后吸收了失业工人赵子俊（1889—1926），进步教员刘子通（1885—1924）、黄负生（1891—1922）等人入党。在中共一大前，武汉地区已有共产党员8人。

其次，组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7日上午，董必武、包惠僧等在武昌举行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8人参加，其中11人为大、中学生。李书渠（1901—1976）做主报告，指出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董必武报告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社会主义“新思潮正在朝我们扑面而来。我们自然要投身到这个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1]他还宣讲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提高团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最后，创建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0年春在武昌涵三宫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校长刘觉民，董必武名为董事，实际是学校的领导人和灵魂，他将早期党团员陈潭秋、张国恩、刘子通、张培鑫等聘为教师和职员，传播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武汉中学不是普通中学，而是武汉党团早期组织的“中心”。^[2]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是在武汉中学举行的，最初的团员骨干分子是武汉中学的进步学生，湖北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也是在武汉中学成立的，组织青年学生和工人学习《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及《新青年》等。李汉俊从上海探亲回到湖北，在这里宣讲唯物史观。

董必武组织学生到附近工厂，与工人



武汉中学旧址

接触，办夜校，灌输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参加工人运动。武汉中学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投身火热革命斗争，成为武汉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骨干。

第二，全程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董必武对大会作出的特殊贡献，就是受大会委托与李汉俊起草了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献。这份文献第一次鲜明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战斗纲领。这个文献虽然至今没有发现，但董必武多次强调它的存在，最早见之历史记载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指出，中共一大曾通过有一份宣言，分成两部分，因大会决定发表授权党中央决定，而党中央没有发表，“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3]

1929年底，何叔衡向董必武询问一大

的情况。董必武12月31日回信特意谈到此事：“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4]1937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斯诺前妻）访问时，他回忆道：在一大上，“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是一份也没有了。”^[5]1956年9月，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我记得很清楚，我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在这个宣言上，党已把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我们斗争的目标。”^[6]1961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前夕，他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查阅当时能够收集到的革命报刊和文献，由沈德纯、田海燕执笔撰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将回忆与研究相结合，专门论述一大提出的两个反对的斗争目标。文章发表在6月30日《人民日报》上，全国主要报刊转载。党在一大上提出了两个反对的口号，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天就能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境”初步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也是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组织、领导、支持湖北学生、工人运动。

党成立后深入群众之中，在湖北掀起



1961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革命运动高潮。1922年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武汉市第39中学）学潮，是建党后武汉地区第一次有影响的学生运动。女子师范学校创建于1909年，是湖北地区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共产党员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担任教师，董必武也讲过课，使青年女学生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刘子通授课很有感染力，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主张妇女参加社会革命，鞭挞封建教育，受到学生热烈欢迎，遭到学校当局忌恨。

1922年2月新学年开学之际，监学（校长）王式玉（湖北安陆人）指责刘老师宣扬“公妻共产主义”^[7]，将其解聘。布告一贴出来，学校顿时炸开了锅。三年级进步学生夏之栩（1906—1987）、徐全直（1904—1934）、杨子烈（1902—1994）、袁溥之（1904—1994）、李文宜（1903—1997）、陈媿兰（1903—1997）等12名学生，于2月21日首先罢课抗议学校当局迫害刘子通。接着各年级学生响应，斗争僵持了一个学



湖北女师学潮学生骨干合影：第一排坐小石者杨子烈、坐台阶者陈媿兰，第二排左为徐全直，第三排夏之栩，第四排坐大石者左为袁溥之

期。暑假中，王式玉在省政府支持下，将夏之栩、徐全直、杨子烈、李文宜、陈媿兰等5位学生领袖开除学籍。9月14日，教育厅奉军民两署密令，将刘子通驱逐出境。开学后，学生不屈不挠继续开展斗争。

董必武密切关注这场学生运动，与李汉俊等直接鼓励学生坚持斗争，在暑假安排被开除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提高她们的斗争觉悟；通过湖北妇女读书会等进步团体支持学生运动，并动员湖北教育界有影响的陈时（中华大学校长）、李廉方（武昌高师事务主任）、刘觉民（武汉中学校长）等名流出面与教育厅交涉。11月，教育厅在各方压力下，只好恢复夏之栩等5位学生的学籍，王式玉“引咎辞职”，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夏之栩、徐全直、杨子烈等成为青年团团员，继而入党。这批女学生，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和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

董必武动员学生深入工厂，组织工会。湖北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汉口人力车夫会、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等组织。在工会的动员与组织下，湖北地区迅速掀起了工人运动风暴。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邓中夏说：“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

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8]

参加湖北自治运动

20世纪20年代，神州大地一度卷起引进西方联邦民主制度的热潮。这个热潮在全国的体现是地方分治、联省自治，在湖北的体现是湖北自治。湖北自治运动的斗争，与其他省份地方军阀联合社会力量反对中央军阀明显不同，是湖北地方势力反对统治湖北的外籍军阀。

统治湖北的军阀王占元（1861—1934），是因民国初袁世凯与湖北军阀黎元洪矛盾，派到湖北替代黎元洪控制湖北的北洋军阀。1915年，袁世凯正式任命王占元为湖北督军（后又任命为湖北省省长），在湖北开始了所谓王占元统治时代。王占元，山东人，

鄂人討論省憲之發軔
 ▲省憲討論會通告
 湖北各界人士。痛覺開專橫。應省憲潮流。特組織省憲討論會。略有端倪。茲得其致各省電文特為錄後。以供關心湖北自治者。
 各省議會。自治聯合會。各省湖北同鄉會。各報館。各法團。湖北旅京同鄉會。天津黎宋卿先生。北原周少揆陳二荃傳。蕪夏仲濟湯錫珪張乾若。饒憲僧諸先生均鑒。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編日得法治是榮。建國中外。罔成易上。願吾國鼎革。迄今十稔。約法簡滿。國。開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中央疲勞。地方競爭割據。茫七萬甸。幾陷異域。憂國者固太息國憲無成懷金賦穀之懼。遂倡議省憲為救球聯串之謀。彼湘粵鄂黔承命西南。論。即魯豫閩浙。則省憲之聲亦彌漫於宇內。潮流至此。鄂憲讓焉。此同人所以首湖北省憲。倡議也。第茲事體大。非凡省憲會議之如何組織。應爭紛爭。省憲大綱之如何規定。始期完善。本三千萬人之心理。考六十九縣風俗。若考當與。若考當革。使成一出入相助之人民。野曠土之區域。則非台策策舉力不為功此同人所以首湖北省憲。論會之籌備也。嗚呼。翹首歐美。治道優良。環顧吾華。脫乎獨後。編推其故。亦惟痛癢無關之官治。不若利害切身之民治也。鄂人先省憲以謀省之安甯。饒國憲。謀國之統一。我國人其察諒之。台端鑒念鄂邦。傾心民治。於籌備省憲。俯荷贊同。遠賜教益。吾鄂幸甚。吾國幸甚。張國恩李廷年陳廷健董用威張會授袁鳳鳴李襄子向天鍾李澤生劉人傑劉子通等同叩

1921年8月2日《大公报》载文

言，省宪为止乱之要图；以环境大势、世界潮流言，省宪实为应时之良策。”^[9]

为了实现湖北自治，董必武代表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与挚友潘正道（鄂西自治军司令）、詹大悲到四川促川

军入鄂。8月中旬，刘湘组成援鄂军，从鄂西进攻宜昌。王占元被迫离开武昌，直系军阀吴佩孚（1874—1939）乘势占领湖北。

董必武随鄂西自治军作为先锋军参加援鄂战争。川军援鄂军、鄂西自治军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在宜昌激战。董必武在1928年的《忆友人詹大悲》中记载了这场战役，主要情节如下：

董必武随鄂西自治军作为先锋军参加援鄂战争。川军援鄂军、鄂西自治军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在宜昌激战。董必武在1928年的《忆友人詹大悲》中记载了这场战役，主要情节如下：

董必武随鄂西自治军作为先锋军参加援鄂战争。川军援鄂军、鄂西自治军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在宜昌激战。董必武在1928年的《忆友人詹大悲》中记载了这场战役，主要情节如下：

吴佩孚新胜湘军，又亲临前敌，气势甚盛。南岸兵虽至，亦不能撑持危局，遂决定退却。我们越天柱山至南沱，过了几天，又由南沱再退，经太平溪、翻铲子崖。我们一直退到秭归。秭归还是守不住，再退。次日到巴东，县署的知事也走了，简直没有人

董必武、张国恩、施洋、刘子通等中共早期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董必武是湖北省宪讨论会的主要成员，目前看到的《湖北省宪讨论会通电》和《湖北省宪讨论会宣言》两份文献均有他的签署（董用威）。两份湖北自治运动的核心文件，声明中国乱源是政体未立，“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当前国家要制定民主根本大法，省宪是国宪的基础，制定省宪“以国体言，省宪为共和之表现；以国情



董必武《忆友人詹大悲》

负责任。那时天下大雨，我们赤脚草鞋，都像雨淋了的鸡，跑到县署内去，好容易才找到了几个干公事的人，叫他们去找地方的绅士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我们在巴东县内宿了一晚上，又过江到北岸电报局内住着。巴东自然也不是我们久站的地方，遂由火峰界岭退巫山。^[10]

湖北自治运动最终由湖南、四川军阀与直系军阀妥协，分别签署了《鄂湘休战条约》《川鄂和约》而彻底失败。

湖北自治运动是董必武在建党时期的重大活动，对他的早期思想转变起到重大影响。董必武参加这场运动是党的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军事统一战线的实践，留下了珍贵的经验与教训。

主要经验：利用南方军阀与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的矛盾，打击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通过军事斗争，进一步推动联邦自治的民主运动。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推动外省军阀援助湖北自治运动。如利用李书城联系湖南军阀援鄂；利用潘正道与刘湘是四川速成学堂同学的关系动员川军援鄂。

主要教训：西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来解决中国根本问题是靠不住的，自治运动的失败使他觉悟到“必须唤起民众参加革命”，利用军阀打军阀只是“一出滑稽戏”。^[11]这样，董必武对中国革命道路、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自治运动失败后，董必武回到武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掀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注释：

[1] 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历史片断（节录）》，《共产

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

[2] 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

[3] 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4] 《关于一大的回忆——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页。

[5] 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

[6] 陈模：《董老的嘱咐》，《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15日。

[7] 《女子风潮四面观》，《大汉报》1922年2月23日。

[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9页。

[9] 《湖北省宪讨论会宣言》，《汉口新闻报》1921年8月13日。

[10] [11] 董必武：《忆友人詹大悲》，《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第9页。

田子渝，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刊顾问

从武汉三中体操队走出舞蹈人生

◇ 刘天喜（口述） 刘宝森（整理）

少年时期，我家住在汉阳显正街朗星巷一个大院里。住的人家多，娃娃朋友自然多，常玩“官兵捉强盗”等游戏，有的还会倒立、翻跟斗，我便有了学的欲望。江汉桥通车后，到汉口居仁门伯伯家很方便，在河边沙滩看到每天晚上有剧团专业人员练功，还有很多小孩搞翻跟头比赛。小孩之间，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对着比，一来二去，便学会了下腰、前翻、后翻。

1962年考进武汉三中读初中，体育老师肖秀仕到我班挑选校体操队员。他将全班同学带到大操场，看每个同学的身材和骨骼，尤其是腿部的骨骼和肌肉。会翻八叉的，会倒立的，还要现场表演给他看。我骨骼好，



1967年12月，刘天喜与体育老师肖秀仕合影

又会打八叉，顺利选入体操队，从此开启其后的舞蹈人生。

三中体操队的“留级生”

参加体操队，我以为就是练习广播体操，入队后才知道体操是一项体育运动，男子体操包括自由体操、鞍马、吊环、纵跳马、双杠、单杠等6个项目，不是会翻跟斗、打八叉就行的。在体操队，我的训练成绩并不好，个子小，力气小，上不了吊环、单杠等体操器械。63届的同学进队后，肖老师安排我与他们一起受训。64届的同学进队后，我又与他们一起受训，成为体操队的“留级生”。

1964年12月，参加武汉市中学生体操邀请赛，倒把我的体操训练做了一次检验：甲组技巧第二名，自由体操第四名，跳马第五名，鞍马、双杠第六名；吊环、单杠是我的弱项，没有取得名次。意想不到的是跳马取得了名次，平时要跳过马都不容易，比赛时却发挥得异常好。从弹跳板起跳后，感觉飞起来了，有足够的时间做动作，取得名次真是高兴极了！把奖状贴在家里墙上，时间长了就烂掉了，真可惜了这几张奖状。

这次邀请赛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只遇上零星几个对手，几乎就是三中体操队自己跟自己赛。在中学建体操队，当时可能只有我们三中。现在回想起来：肖秀仕老师培养出那么多体操运动员在大学当教练，他的学生又培养出奥运体操冠军、世界体操冠军，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终身奋斗的必然结果。肖老师为中国的体操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5年1月5日，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闭幕，当晚体操队参加学校在汉阳的大游行。肖老师精心组织指挥，安排四个高中生抬一个弹跳板，上立一个体操运动员



1966年4月，刘天喜在体操房旁双杠练习倒立

高举火把，走一段路后换一组人，行进井然有序。我是立在弹跳板上举火把的一个，换下来后就参加地面技巧表演。这次表演，是首次离开体操垫子，在柏油马路、水泥地上翻跟斗，为我日后在各种舞台上的表演打下基础。

1965年，三中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我们这一代体操队员由体操比赛转向文艺表演的一次大演习。“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游击队员之歌”等舞蹈，充分体现出体操队员的技巧与功底。

“飞夺泸定桥”中，无论连续蹲转劈砍的刀舞，还是运用滑叉技巧的枪舞，体操队员都较完美塑造出红军的英勇形象。接着，双刀快速串翻身、跳跃偏腿转、连续扎头旋子，然后一排小翻和腾空跃起的大跟斗，一环扣一环，一浪推一浪，十分出彩。体操技巧在舞蹈中的成功运用，为排演《东方红》增加

了亮色。《东方红》的演出，成为武汉三校史上规模空前的文艺盛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初中临近毕业时，肖老师问我：“准备考哪里？”

我说：“考技校。”

“不，你要读高中，准备上大学。你第一志愿就填‘三中’。”

我听了肖老师的话，填报了本校，高中时继续是体操队队员，课余时间接受体操训练。1966年下半年起，日常训练受到冲击，体育比赛也停止了，但我仍在体操基本功上不断下功夫。1967年，肖老师带领我、涂厚成、叶远华等几个队员，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以此坚持体操训练、展现体操舞台魅力。

宜昌县文工团的“阿庆”

1969年秋，“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我随学校下放到宜昌县仓屋榜公社。1970年春，我在武汉过完春节回宜昌，在船上遇到武汉墨水湖中学老宣传队的孙月华、刘汉英、周启会、张银河一行，留下了联系方式。



1969年2月，刘天喜留影

1970年10月，宜昌县举办文艺汇演，从知青中挑选人才办现代戏学习班，墨水湖中学老宣传队的四位全部入选，他们热情推荐：“武汉三中体操队的刘天喜下放在仓屋榜公社，能翻跟头。”



2008年，刘天喜排练舞蹈《奥运火炬》

主管学习班的县人武部田部长一听大喜，立即派人通知仓屋榜公社人武部。接到电话，公社人武部长亲自到官庄水渠工地通知我去县人武部报到。随后，派人把我的被子行李送到县里，当晚就在县人武部住下来，成为学习班的一员。后来，学习班直接挂牌“宜昌县文工团”。

同时进文工团的知青各有所长：周锦重二胡，刘汉生笙、小号，张银河长笛，张明圆号，舞蹈孙月华、刘汉英、卢亚、谭菊芬等。在现代戏中，孙月华饰演《红灯记》李奶奶，刘汉英饰演《沙家浜》卫生员和《龙

江颂》阿莲，雷桂安饰演《沙家浜》胡司令等反派角色。

我属武功演员，主要翻跟斗，演出时很辛苦。一排跟斗翻过去，马上从后台跑过来，接着又翻；穿正面人物的服装翻了，还要穿反面人物的服装翻。翻得黑汗水流，功夫还是很过硬的，可就是没在台上亮过相、露过面。

有些熟人知道我在文工团，但不知道我是演么事的。常有人问我，开始答不上来，次数多了，我就说：我是演“阿庆”的。有的人一下反应不过来：喔，演阿庆。

怎么是演“阿庆”的呢？《沙家浜》“智斗”一场，胡传魁与阿庆嫂有一段对话：“阿庆呢？”“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就是这几句台词提到了阿庆，实际戏中并没有这个人物上台，我不就像阿庆一样吗？

每年春节，我们都要随县政府慰问团，到部队和三线工厂慰问。一次，部队首长考虑演员演出之前不能喝酒，就安排演出后到大食堂吃夜餐。一位宣传干事很认真，站在门口接待，前面演员进去时都挺热情，轮到我则有点疑惑：“同志，你是演？”我顺口一答：“我是演阿庆的。”刚好“阿庆嫂”跟着来了，宣传干事问：“你们那个演阿庆的，好像没看见他上台呀？”她回答：“我们哪有演阿庆的？”宣传干事赶紧追过来：“同志，同志！”我转过身来，“阿庆嫂”笑了：“他呀，是跟你开玩笑的！”

电影《山楂树之恋》的舞蹈编排

1976年10月，宜昌县委组织部安排我到宜昌县气象局工作。

2003年，宜昌市夷陵区举办“文明之光”文艺汇演，气象局作为文明单位参加演出，我自编自演湖北评书《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亮相。从这开始，夷陵区逢有较大型文艺活动，就把我请出来，由此重上舞台。

巴山南麓，民间古来流传“薅草锣鼓”（后来进入第二批国家非遗目录），每当苞谷薅草的季节请人帮工除草，同时专门请一拨职业或半职业歌师在山坡为薅草的人们演唱。2006年12月28日，我参加表演的舞蹈《薅草锣鼓》，在夷陵区电视大奖赛中获得万元大奖。

大山里山路蜿蜒陡峭，男子汉不惧艰辛，靠肩挑背驮把山里的特产带到山外，换回日用品。我参加表演的群舞《爷爷的大山》，没有类似背篓的实物道具，全部用负



《山楂树之恋》舞蹈编排刘天喜（右一）、孙月华（左三）与舞蹈演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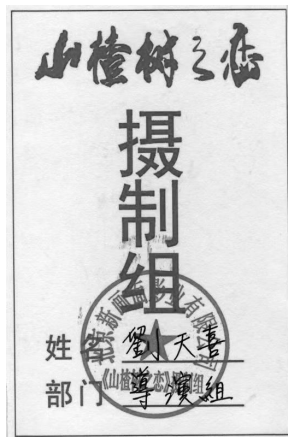
重的姿态来展示，音乐又采用三峡地域的山歌形式，颇有特色。2006年12月，在湖北省第十一届“楚天群星奖”比赛中，获得老年组金奖。2007年11月，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演出。2008年11月，参加文化部在苏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文艺汇演”，获得铜奖。此外，参加中央电视台《我们有一套》栏目的比赛，与福建永定客家土楼李福渊的《乐器演奏》《一举两得》、河南禹州黄沟村苏全占的撕纸、河南省濮阳清丰县王乾洲的《武松打虎》打擂，在国庆前夕的9月30日播出。



2010年，刘天喜在舞蹈《洗衣歌》中饰演解放军班长

2009年，我从气象局退休后，参加丁家坝社区组织的“真情艺术团”，排练的第一个舞蹈就是《洗衣舞》，由县文工团同事孙月华编舞，我饰演解放军班长。

2010年初，张艺谋来宜昌拍摄电影《山楂树之恋》，讲述的是知青故事，电影里要



2010年，《山楂树之恋》摄制组证牌

拍舞蹈《洗衣歌》。我和孙月华都是知青，又是文工团同事，一天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张艺谋邀请我们担任《山楂树之恋》摄影组的舞蹈编排。我喜出望外，连忙从武汉乘坐动车赶往宜昌。

遗憾的是连阴雨下个不停，《洗衣歌》没有拍成，改在宜昌612厂礼堂拍舞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由电影学院和艺术学院的学员担任舞蹈演员。我协助孙月华负责舞蹈编排，由此“触电”一回。

参加武汉三中体操队使我一生受益。退休后，我联系上不少老体操队员，时常共同回忆在武汉三中体操队的生活。我将大家荣获的奖状、奖杯及文体活动的留影汇编成册，成为肖秀仕老师桃李满天下的一个见证，也为后人留下一份记忆。

刘天喜，宜昌市气象局退休干部；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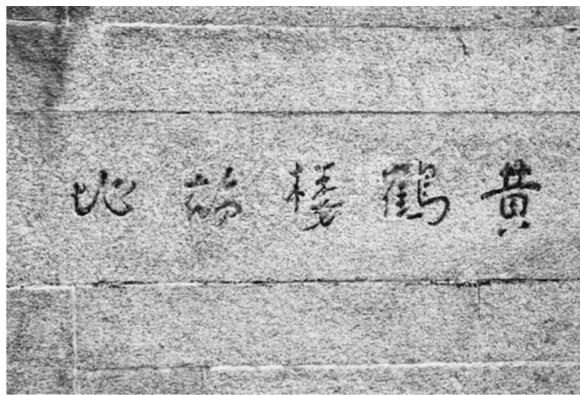
武昌地名的由来与黄鹤楼故址

◇ 刘谦定

20世纪50年代，在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引桥从黄鹤楼故址经过。1981年10月，在距黄鹤楼故址约千米的蛇山峰岭上，重建黄鹤楼工程破土动工，于1985年6月10日竣工落成。

今天的黄鹤楼，是以清同治年间重建的黄鹤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美誉。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蛇山西端的长江大桥交相辉映，登楼远眺，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底。

黄鹤楼故址位于今“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所在高台处，其台基上镌刻有“黄鹤楼故址”五个字，面临长江与武昌桥头堡。



“黄鹤楼故址”石刻

“黄鹤楼故址”灵动潇洒，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所书，现已成为地理标记，为市民和游客指明了古代黄鹤楼所在的具体位置。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纪念碑

地名武昌

“武昌”二字作为地名，最早源于今天的鄂州市。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刘联合在长江中下游的赤壁打败了曹兵。219年，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遭吴军偷袭，败走麦城被杀。

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县，置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雒、柴桑、浔阳等六县，“武昌”作为地名从此开始出现。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次年，孙权改元“黄武”，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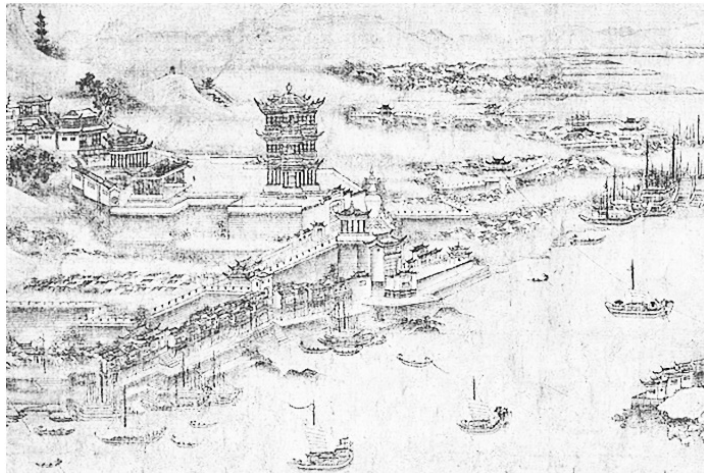
同在这年，刘备亲率大军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并争夺荆州，结果在彝陵（今宜昌东）一战，几乎全军覆灭。吴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为固守江南，拱卫都城武昌（今鄂

州市），始筑夏口城。在近江水段，板筑土石结构的夏口城方圆虽然仅二、三里，但实为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这就是武昌始筑城垣的起点，至今已有1800周年。相传，“黄鹤楼”就是当时建在夏口城内较高处并紧靠城墙的“瞭望哨所”。

承载黄鹤楼的“江夏山”亦名蛇山，虽不高峻，但它与龟山（亦名大别山）紧锁长江，显得格外重要。千百年来，可以说蛇山就是“武昌城城根”或“武昌城脊梁”。以夏口城为起点，直至历代改建扩建这座城池的座标，一直都是依托蛇山而从没有脱离过。

南朝刘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置郢州，州治设于拥有黄鹤楼的城中，于是便在夏口城的基础上修葺扩建，并改名为郢州城。

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其治所亦设在拥有黄鹤楼的城池中。从设置江夏县开始，荆楚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已顺长江下移到了江汉交汇处一带，郢州城也改名为鄂州城。



《江汉揽胜图》中的武昌城垣和黄鹤楼



明代扩建定型后的武昌城垣与忠孝门（俗称小东门）

随着隋唐时期的经济迅速发展，江夏县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提升，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始置“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鄂州刺史和武昌军节度使的治所，当年也是设在江夏县县城中。

南宋时期，因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湖广总领所”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鄂州（今武昌）设立，该所统管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其军政、经济等地位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朝廷将“武昌”作为了“路”一级行政建制的名称，武昌路治所仍设置在江夏县县城中。关于武昌路的地理形胜，元人元明善说：“武昌，壟山而城，堑江而池，挟滇益，引荆吴，据楚中，而履南越。”元代湖广行省武昌路，沿袭宋代鄂州所辖七县之地，变化的只是州升路和增置录事司，户口则增加近两万户。

元代始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辖武昌路等，其行政区划范围很大。明朝建立

后，海南及钦、廉州划归广东，“湖广行省”称谓从此则专指今天的湖南与湖北这一区域，当年湖南、湖北这样的行政地理名称还没有出现。明承元制，始置“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统领湖广政务等，其治所设在武昌府城暨江夏县城之中。

明朝的“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下辖：位于今湖北全境的有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德安府、荆州府、襄阳府、郢阳府；位于今湖南全境的有：辰州府、岳州府、宝庆府、长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黎平府。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增设了巡抚署（类似现在的省政府）这一级行政管理机关，从此湖南、湖北在湖广行省的辖区内，开始分省而治。

朱元璋改“武昌路”为“武昌府”，“武昌府署”亦设置在江夏县城中，在明清两代一直都未变更，武昌府署雄踞江南成为了湖广行省之“首府”。据史料记载，从清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湖北巡抚署治所的“抚

台大人”（相当于今天的省长），领治督办十府政务。这时的武昌府（治所位于今户部巷西侧），管辖“一州九县”，即：兴国州（今阳新县），江夏县（包括今武昌、青山、洪山、江夏区），武昌县（今鄂州市），嘉鱼县，蒲圻县（今赤壁市），咸宁县（今咸宁市），崇阳县，通城县，通山县，大冶县（今大冶市和黄石市）。

因此，黄鹤楼下的这座武昌古城池，它既是江夏县的县城所在地、又是武昌府的府城所在地、也是湖北省的省城所在地，同时还是湖广督署治所和制台大人办公的所在地。

今天的武昌，历史上虽然曾称之为“夏口”“鄂州”“鄂州”“江夏”等，但实际上早在唐代，江夏县所在的地域即有了“武昌”的称谓。

因为唐、宋、元、明、清历代有武昌军、武昌路、武昌府之设，于是“武昌城”就约定俗成替代了江夏县县城的称谓。最早见有李白《送储邕之武昌》诗为证：“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民间为了区分地名中出现的两个武昌，则称拥有黄鹤楼的武昌城为“上武昌”，历史上位于今鄂州市的武昌县县城则称“下武昌”。

1912年，辛亥革命诞生的中华民国废除了武昌府，宣布以“武昌”为湖北省省会，江夏县改名为“武昌县”，于是县衙署由武昌文昌门内的花堤街口铁佛寺，迁到汉阳门正街原武昌府署（今民主路63号）。这时已有千年历史的“武昌县”则被改名为“鄂城县”，直至1983年升格为省辖市时改名为“鄂州市”。

民国时期，武汉的行政区域时分时合，数易市政机关名称，曾有武汉（特别）市、汉口（特别）市、武昌市政府（处）。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的汉口、武昌两市重新恢复建制。1946年10月10日，在“武昌市政府”正式成立后，武昌县县衙署曾一度迁至纸坊镇老街（今江夏区区委党校处），次年又迁回武昌胡林翼路（今民主路63号）。

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解放，原汉口市、武昌市和汉阳县城区在5月24日合并成为“武汉市”，“武昌市”从此更名为“武昌区”。1949年6月10日，武昌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县政府机关迁至武昌长春观东侧。1957年7月12日，又迁至武昌傅家坡（今武珞路285号）。1960年，最终迁出武昌区，设在武昌县纸坊镇江夏路3号。1995年3月，武昌县撤销并改名为“江夏区”。



清同治年间，武昌城城墙雉堞、黄鹤楼及“南维高拱”匾、胜像宝塔等清晰可见

“武昌”二字作为地名使用的，目前就只有武汉市的“武昌区”了。

崔颢题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战乱持续三百多年。隋、唐统一全国后，才出现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黄鹤楼由军中哨所，逐渐演变成为了著名旅游目的地，吸引文人墨客争相登临。俯视浩瀚大江，纵览荆吴形胜，许多名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与名篇。

唐代诗人崔颢题写《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据说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之前，他曾漫游江南一带。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极高，如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称赞：“唐人七律诗，当以崔颢《登黄鹤楼》为第一。”黄鹤楼与崔颢，就像滕王阁与王勃，敬亭山与李白，寒山寺

与张继一样相遇相知，彼此成就，相得益彰，成千古绝唱。黄鹤楼因有了崔颢的诗而名冠古今，以其“尤著特色”而“号为天下绝景”。于是江城武汉也就有了“白云黄鹤之地”的别称。

传说，诗仙李白登临黄鹤楼时意欲提笔作诗，但突然发现了墙壁之上已有崔颢的《登黄鹤楼》，他连称“绝妙”，并脱口而出说了四句顺口溜来抒发感慨：“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说罢，他便搁笔不写了。后来，有好事之人在黄鹤楼的东侧，兴建了一座彰显李白性情豪爽的“搁笔亭”，从而把这个故事敷衍成了千古佳话。

黄鹤楼是诗仙李白抹不去的情结，能为他如此高度关注，足以表明黄鹤楼在唐代的人气已经非常旺盛。对于黄鹤楼，李白并未搁笔，他写了多首涉及黄鹤楼的诗，如《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黄鹤山》《鹦鹉洲》等。李白真乃黄鹤楼的著名知音之一，他的一首“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

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使武汉拥有了“江城”这一享誉千载的大美别名。

中唐时期，黄鹤楼已称许为“荆吴形胜之最”。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阎伯瑾应鄂州刺史穆宁之命撰写《黄鹤楼记》载有：“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崔嵬几个，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



清同治黄鹤楼下城墙外，许多易燃物埋下隐患



清光绪十年（1884年）《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古迹云云图》，出自名画家吴友如，描绘了黄鹤楼被大火焚烧及救火的场景

亦荆吴形胜之最也……游必于是，宴必于是。极长川之浩浩，见众山之垒垒……”今天重温，仍然能想像出当年黄鹤楼的宏伟壮观。

黄鹤楼在唐宋时所凝聚形成的“诗文化”独步天下，真可谓达到“天下极致”。然而，黄鹤楼之后命运多舛，兵燹频仍，屡建屡废，仅在明清两代，就被毁7次，又重建与维修了10次。因此，历史上便有了“国运昌则楼运盛”之说。

鄂垣大火

清代丁国存《重建武昌黄鹤楼碑记》，载有“至咸丰丙辰（清咸丰六年即1856年），兹楼遂一炬”之说。然后，他在碑文中还详细记下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黄鹤楼的具体时间：“涓吉于九月初八日定磬，十月十二日上梁”“次年六月，大工成”“计

糜捐银三万余两”“楼凡三层，计高七丈二尺；加铜顶九尺，共成九九之数。……楼八面，各宽四丈五尺。”

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主持重建的黄鹤楼，乃是我国帝制时代在黄鹤楼原址上重建的最后一座，共动员工匠一千多名，用时十个月。非常遗憾的是，这座“清同治黄鹤楼”落成只有16个年头，于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四（1884年9月22日）被大火烧毁。

曾被誉为“中国近代信史”的上海《申报》，在清光绪十年八月初九登《鄂垣大火》的消息：“初四晚，鄂垣北风劲疾，江上雪浪如山，七点半钟时，汉阳门外街东门坡地方，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灯倾落，施救不及，遂成燎原。当时延烧筷子、骨牌、咸包等作坊，复飞至江柴院子与王家板厂。箕伯扬威，火鸦飞舞，城内黄鹤楼第二层护栏亦被延及，立兆焚如。先是有多人立在楼前左右观火，及楼经焚着，内外夹攻，看火人均往后山撞倒栅栏而走。附近黄鹤楼之官厅与涌月台亭顶，同付一炬；幸胡文忠公祠、祖师殿、鲁班阁并茶馆无恙。烧至八点多钟，楼向南倒，计沿江一带木作坊厂、铺面、住宅约共焚去二百家左右。十一点钟，火又延至平湖门沟边始行止熄，所奇者汉阳门外之油货、豆豉、饭馆三家，面面皆火，而彼则岿然独存。”

所幸的是，这最后一座黄鹤楼的铜铸

宝顶侥幸留了下来，至今仍然保存在黄鹤楼公园内。

得名来由

关于黄鹤楼名称的来历，有“因山得名”和“因仙得名”两说。

“因山得名”说的最早记载在盛宏之《荆州记》中：“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称耳。”《荆州记》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它虽然没有直接指称“黄鹤楼”，但说到后人在黄鹤矶上建楼，因以为名，很显然说的就是黄鹤楼。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江南道三》记载：“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显而易见，黄鹤楼因是建在黄鹤矶上而得名，属于军事性质的瞭望哨所。

《明史·地理志》“江夏县”中记载：“东有黄鹤山，下有黄鹤矶，临大江。”《大清一统志》记载：“湖北武昌府，黄鹤山在府城内西隅，一名黄鹤山。”《武昌府志》记载：“黄鹤山曰高冠山，西至于江，其首隆然，黄鹤楼枕焉。”

到了近代，民国文士员在《武昌要览》中记有：“黄鹤山，起城东而达于西隅，黄鹤楼枕焉。山旧名紫竹岭，以有黄鹤腾紫竹间，故名黄鹤。鹄转音为鹤，故又称为黄鹤山。山形蜿蜒，宛如长蛇，俗称蛇山。滨江处曰黄鹤岸，岸下曰黄鹤矶。高观山即黄鹤山中峰，高可瞩目，故名，或曰高冠山，以状肖冠也，明楚藩易名长春山。黄鹤楼在汉阳门内黄鹤山头，因山得名，号为天下绝景。”

黄鹤山与黄鹤山都是现如今武昌蛇山的古称之一，因“鹄”“鹤”二字可通假，于是就有了“黄鹤和黄鹤”两种称谓。黄鹤楼虽屡建屡毁，但始终都是建立在黄鹤矶上，古人因矶名楼而故称黄鹤楼。

但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因仙得名”说，其主要的流行说法，源于《报恩录》记载：

“黄鹤楼原为辛氏楼。辛氏市酒山头，有道士数诣饮，辛不索资，道士临别，取桔皮画鹤于壁，曰：客至拍手引之，鹤当飞舞俯觞。遂致富。十年，道士复至，取所佩铁笛数弄，须臾，白云自空飞来，鹤亦下舞，道士乘鹤去。”之后，又有《南中记闻》补充说：道士去后，“辛氏舍宅筑楼以供纯阳吕师”，即“八仙”中的吕洞宾，随之发展成“楼三层，层层供奉吕仙，角巾羽服，横笛，制甚古。”而且，还在黄鹤楼旁兴建一座“吕祖阁”，阁内供奉的“吕祖卧像”远近闻名，因口碑相传有求必应而香火始终旺盛。

按南宋张栻《南轩集·卷十八·黄鹤楼说》记载：“楼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题诗窗间，遽相传曰：此唐仙人吕洞宾所书也。文人才士又为之夸大其事。”这说明了南宋初期，黄鹤楼才跟吕洞宾扯上关联。之后，《道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五·吕嵒》记载：“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全真晚坛课功经》中也称其“黄鹤楼头留圣迹”。于是，黄鹤楼便成为了吕祖吕洞宾的升天圣迹之地。

吕洞宾故事于元、明、清三代流传甚广，后来居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因吕祖信仰在武汉三镇民间非常接地气，“驾鹤仙人”的黄鹤楼故事由于忌讳无趣，几乎再没有人多话，所以吕祖吕洞宾与黄鹤楼以及与江城

老百姓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仙得名的另一说则源于“费祎”，唐代阎伯瑾在《黄鹤楼记》中写有：“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载：“黄鹤楼在县西二百八十步，昔费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憩驾，故号为黄鹤楼。”

费祎是三国时期很有名的蜀国相臣，他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费祎为人忠诚善良，性情温和，因其明义理而又正直，深受诸葛亮好评。费祎后来在蜀汉举行的岁首大会时被郭修所杀，但许多人同情怀念他，便说他去世后成仙，驾黄鹤到“州城西南隅”稍作休息。于是乎，费祎休息过的地方就被称为黄鹤楼。

“费祎登仙”只是黄鹤楼名字由来的传说之一。《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郢州》中记有：“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榭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此中仙人名叫“子安”，但遗憾的是没说明姓氏。显而易见，“费祎”与“子安”这两位仙人是不可混淆的，记述的文字有所不同：一是“子安乘黄鹤”，一是“费祎驾黄鹤”。

崔颢《登黄鹤楼》诗句中的“昔人”到底指谁呢？应该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指传说中的人。关于这个传说中的“昔人”，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子安”；第二种是“费祎”。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现在已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找到了。但是，通过研究李白的诗作，似乎还可以窥探到他心中的黄鹤仙人到底是谁。

李白面对崔颢的《登黄鹤楼》，虽没

写出比崔颢更精彩的七律大作，但他在其它的诗中多次写到黄鹤与黄鹤楼，如《望黄鹤楼》：“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岩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还有一首《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根据李白在这两首诗中所向往并讴歌的列仙学飞术和仙人乘黄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心中乘黄鹤的仙人就是“子安”。

李白的诗句“仙人有待乘黄鹤”，与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都与《南齐书》中的“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基本一致，其重头戏就落在了一个“乘”字上。

黄鹤楼“因山得名”奠定了地理学基石，“因仙得名”亦令赏楼者插上了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满足了人们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的需求。两种说法各有特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必将彼此交相辉映直到永远。

刘谦定，武汉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桂子山上的亮丽名片

——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

◇ 罗 松

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坐落于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身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2022年新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华师大博物馆坚守珍藏历史、传承文明的使命，发挥文物收藏、展示、鉴赏、研究等功能，为百年学府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华师学子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学校文化血脉、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桥梁，也是学校对外展示的一张亮丽名片。

钱基博领衔筹建

说起华师大博物馆的收藏与陈列，不得不提到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钱基博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古文学家、教育家，钱钟书之父。博物馆筹建之初，钱基博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率先捐赠个人珍藏211件（玉器26件、铜器80件、历代货币52件、古瓷25件、书法绘画28件），带动张舜徽、



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外景

王爱施、朱明庭等校内外知名人士捐赠共计500余件，极大丰富了馆藏，为陈列提供了珍贵展品。

钱基博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高校最早研究博物馆学的专家之一，身体力行于研究与实践。他在慷慨捐赠的同时，对文物的类别、用途、年代、鉴定等作出说明，并整理成研究资料。在钱基博捐赠展厅，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宝，印章、美玉、青铜器、陶瓷等珍奇古玩，穿插名人手迹册页，让观众领略到一代文士的儒雅风流。当我们近距离观赏钱基博20世纪50年代亲撰的《捐赠文物登记册页》《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时，睹物思人，能真实感受到老一辈学人严谨治学的态度与精神。

走进器物珍藏展厅，宛如置身精品文物长廊，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的历代文物各放光辉，美石、秀玉、古陶、珍瓷、青铜器、佛造像、铸钱、织锦、鼻烟壶，形态多姿，古色古香，寄托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审美趣味。

在书画珍藏展驻足，丹青流韵，翰墨

飘香，唐《敦煌石室写经长卷》，明《陆治人物图轴》，清《马荃花卉长卷》《莲溪东方朔献寿图轴》《王翬山水图轴》《苏六朋东坡游赤壁图轴》《仿唐寅钟馗打鬼图轴》等精美佳作，悦人眼目，美不胜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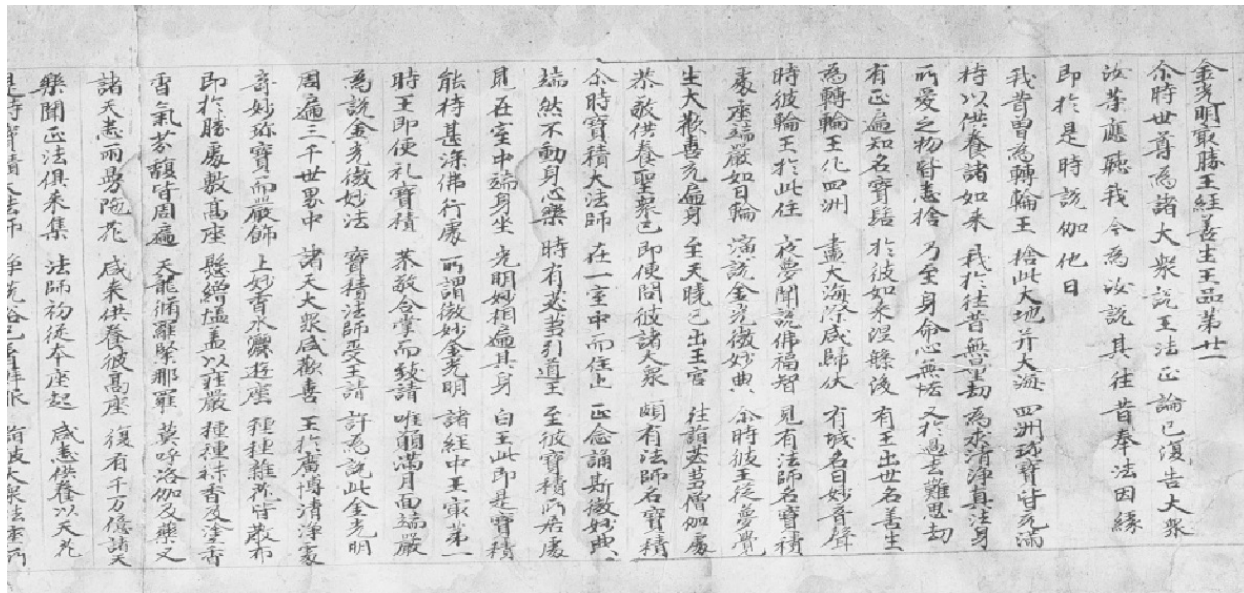
历经70年的建设和积累，华师大博物馆收藏有近2万件藏品，时代跨越新石器至夏商周，历汉、唐、宋、

元，迄于明、清、民国，涉及石器、玉器、铜器、造像、陶瓷、书画、印章、钱币等等多个门类，其中珍贵文物243件套。一些代表性文物，蕴含独特丰富的人文信息，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唐《敦煌石室写经长卷》

敦煌遗书，是指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印本、拓本文献，誉为“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发现之初，大量文献被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捆载而去，分布在世界十几个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馆藏长卷是佛教经典，属于敦煌遗书的一部分。卷首写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善生王品第二十一”，卷尾写有“金光明经卷第九，三藏法师威仪”。《金光明经》又名《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开阐如来秘密心髓、忏悔业障、积聚福德资粮以及弘扬佛法、护国利民等方面，具有无比殊胜的功德。长卷历经千年，仍保存完好，全卷无缺损虫蛀，干净整洁，实属难得精品，具有很高的文献价



唐《敦煌石室写经长卷》（局部）

值、史料价值。卷面字体笔力苍劲稳重刚劲，舒展自然，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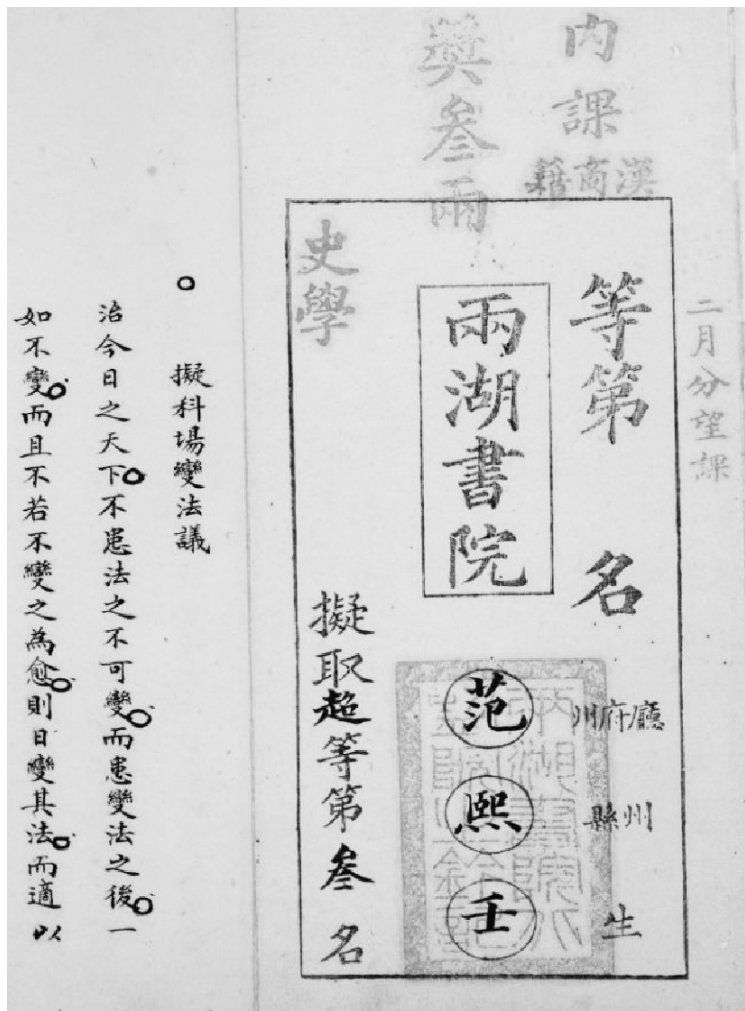
长卷由张舜徽先生于1953年建馆时期捐赠。张舜徽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出生于湖南沅江的书香世家，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师执教40年之久，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首任会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一生完成学术著作24部，共计800万字，其学术著作全部由毛笔撰写完成。

两湖书院课卷遗存

两湖书院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所建书院，院址在营坊口天符庙及都司湖一带。甲午战争后，两湖书院除旧布新，培养目标发生转变，突破旧学的桎梏，大胆引进西学。教学理念的转变，直接引起了课程设置、教学管理体制的变革，也宣告了湖北地区旧时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

两湖书院招收湖南、湖北两地的学生，按籍贯分配相应比例。课程初期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6门，后取消理学、文学、经济学3门，增设舆地学、兵法、格致、体操等。学生成绩的考核分为月考和大考两种：月考在每月月中和月末各一次，大考则每半年一次。月考后，成绩等级依次分为超等、特等、平等，并按等级发给学生奖银。

馆藏《两湖书院课卷遗存》共计19卷21册，多数为范熙壬考试所写，从中抽取四份课卷，卷首题字相关信息为：《拟科场变法议》，卷首题有“二月份望课”“内课汉商籍”“奖三两”“两湖书院”“范熙壬”“史学”“拟取超等第三名”等文字；《书〈元史·食货志〉后》，卷首题有“六月份朔课”“内课汉商籍”“特等第四名”“汉阳府黄陂县附生”“奖一两五钱”“两湖书院”“范熙壬”“史学”“拟取特等第四名”；《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卷首题“七月份朔课”“内课汉商籍”“汉阳府黄陂



两湖书院课卷《拟科场变法议》（局部）

县附生”“奖一两五钱”“两湖书院”“范熙壬”“史学”“拟取特等第三名”；《张浚论》，卷首题“三月份朔课”“内课汉商籍”“特等第二名”“汉阳府黄陂县附生”“两湖书院”“范辂”“史学”“拟取特等第二名”。

从卷首这些信息，可看到考试时间、籍贯、学科、名次、奖银等信息，课卷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课卷均小楷写成，字体俊秀遒劲，卷面整洁干净，赏心悦目。有些文字旁有大量的小圆圈、黑点。据了解，单圈的作用相当于逗号和句号，黑点和双圈是为了标注重点，连续圆圈是表示赞赏。

这批试卷由肄业于两湖书院的学生范

熙壬所藏，他是湖北黄陂人，近代追求中国复兴之梦的先驱之一，民国政要。辛亥革命爆发后，热情支持共和制，任湖北都督府总务科秘书。1913年以高票当选众议院议员，此后参与议会运作，为推行民主法治而不遗余力。1924年冬，以议会领袖身份赴天津迎接孙中山北上。20年代初，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2022年，华师音乐学院教授、范熙壬外孙女张昌年及丈夫俞汝捷，将珍贵的19卷课卷遗存捐赠给博物馆。

百年学府，桂子芳华。华中师大博物馆不仅是展现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更是学校对外交流和展示的窗口。为传承学校文化与历史，打造高校美育建设，每年都在校内招聘志愿讲解员，除了各院系的本科生，还有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的硕士研究生。讲解员团队拥有

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储备，能专业地服务各类观众群体，在满足本校师生的需求的同时，接待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大中小团体、教师培训团、高校专家学者等，得到观众赞赏。

罗松，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馆员

武汉大学校园环境整治

◇ 徐应荣 任珍良 刘家旭（口述） 任 怡（整理）

东湖之滨，珞珈山麓，武汉大学风景秀丽，具有天造地设的灵气。湖水荡漾，植被茂盛，四季鸟语花香，校园充满特色与活力，是莘莘学子放飞梦想的理想园地。1938年来过武汉大学的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把珞珈山校园誉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

然而，武汉大学“流风甚美”的校园，一度出现的环境状况，与其美誉形成巨大的反差。

1995年10月13日至16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来武汉大学检查工作后说：“武大是一所百年老校，校园环境优美，但我也

看到了不美的一面，都是校园的主要地方，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全国其它高校中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严重的了。”

据1996年调查统计，28家校外单位和600余户社会居民，占用武汉大学8片232亩土地。其中：校大门主干道西侧杨家湾64亩，中心地带老菜场片4亩，桂园学生区19.65亩，东湖水厂44.97亩，东湖边省体工二大队23.62亩，凌波门西侧电离层观测站7.77亩，珞珈山东山头铁道部疗养院46.68亩，珞珈山东麓风光村22.66亩。

这些单位和居民拆墙开店，一哄而起新开的各类商家达122家，校园主干道大排

档超过 100 家，经营台球室、录像厅、游戏厅、茶屋、歌舞厅、发廊、按摩室等，昼夜烟雾弥漫，喧哗闹腾不止，甚至从事黄、赌、毒违法活动。校内发生的案件，50% 的治安案件和 70% 的刑事案件与校外人员有关。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谈到校园育人环境问题时指出：武汉大学也是这样。校门口曾到处是烟熏火燎的大排档和酒吧、发廊，学校内则有 232 亩土地被 28 家校外单位和 600 余户居民长期占用，一个完整的大学被分割七零八落。……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生活秩序。……总之，一个高校，无论是校园内部，还是校园周边，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适宜于教学科研、学生读书学习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那种校园内乱七八糟，校园周边又被各种摊贩所包围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省委书记、省长现场办公

1996 年 2 月 27 日，春节刚过的农历正月初九下午，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武汉大学人文馆举行现场办公会，省委书记贾志杰主持，省长蒋祝平、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及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

会议要求，省、市政府职能部门站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进“科教兴国”和“科教兴鄂”的高度，采取坚决的态度和过硬的措施，整治武汉大学校园育人环境。会议确定整治的基本原则是：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先急后缓、妥善安置、保持稳定。具体措施是：逐步将校外单位和社会居民迁出校园，彻底清除影响校园育人环境的根源。

现场办公会的规格之高、领导的重视程度之高，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全国高校中也不多见。因此，这次会议称为“二·二七会议”。

武汉市成立以殷增涛副市长为组长的专班，具体负责整治工作的实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督办，定期检查落实情况。武汉大学成立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实行双组长负责制。领导小组下设“二·二七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从设立到撤销存续 8 年之久。

老菜场片平稳外迁

老菜场片处在校园中心地带，四周紧邻新图书馆、梅园学生宿舍及食堂、二区老教授住宅区、校医院，该地带环境的脏乱差路人皆知，师生员工怨声载道。

老菜场片的商业服务网点，有菜场、饮食店、副食品店、理发店、煤店、新华书店、邮局等，曾经起到良好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凭票供应成为历史，原有功能逐渐退化，有的出租门面维持生计，有的开墙摆摊占道经营，有的改换门庭另择新业。



老菜场片旧景

一时，出现门店、摊位 31 家，涉及饮食、副食、礼品、书刊、照相、台球、卡拉 OK 等，造成学校中心地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交通拥堵、秩序混乱，时有严重纠纷和斗殴事件发生。由此，不仅严重干扰教学、科研、管理及生活秩序，而且大碍观瞻，可谓校园中的“心腹之患”。

1996 年 12 月 21 日至 30 日，老菜场片 8 个校外单位和 5 户社会居民，除邮局和书店暂缓外，全部一次外迁到白沙洲武泰闸附近，4 亩用地由学校收回。2005 年底，邮局和书店迁出，由其主管部门在校外安置。

老菜场片外迁，校园中心地带面貌一新，为后来整修校园道路、扩建新图书馆、兴建万林艺术博物馆等项目，提供了发展空间。



在老菜场拆迁后西侧建成万林艺术博物馆

杨家湾终成历史

武汉大学校园曾有一个类似乡村的名称：杨家湾。

杨家湾也叫新村湾，位于武汉大学大门主干道西侧，即现本科生院办公大楼（原出版社大楼）、振华楼（现历史学院、哲学学院、文学院办公楼）、雷军科技楼一带。

按照“二·二七会议”要求，杨家湾是重点整治地段之一。据 1996 年 3 月摸底调查，杨家湾占地 64 亩，有 14 个校外单位、400 多户社会居民。由于涉及面较大，情况很复杂，拆迁难度大，因此拆迁分两期进行。



武昌区政府在杨家湾供销社门前召开动员大会

一期工程是：紧靠学校大门主干道西侧的校外单位和住户一次性外迁，彻底改变大门一带脏乱差形象。一期占地 22.4 亩，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据实地调查，应拆房屋 10427.99 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 1192.7 平方米，涉及 9 个校外单位、173 家住户。拆迁从 1998 年 11 月 19 日正式启动，至 1999 年 1 月 30 日基本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在杨家湾外迁地块上兴建的振华楼

2000年4月1日上午，省政府在珞珈山召开现场办公会，启动二期工程，要求力争在7月1日前完成。二期占地41.6亩，房屋建筑23620.97平方米，涉及5个校外单位、251家住户。

由于工作专班勤勉努力，措施得当，思想工作细致入微，二期按时顺利完成。考虑到珞珈山街办事处、派出所、居委会面向师生员工服务，迁出后由学校邻近家属区安排办公地点。二期完成后收回土地41.6亩，连同一期收回22.4亩共64亩，杨家湾终成历史。

桂园路达标“美容”

桂园路是文理学部化学学院与工学部相连的主干道，长约700米，宽约4米，沿途既有教学单位，也有学生宿舍和食堂，还有附小与幼儿园。路面坑坑洼洼，污水四溢，西侧还有4000多平方米违章建筑，曾是录像厅、游戏机室及小酒店、发廊等云集的场所，一度成为育人环境的“重度污染源”。

2000年9月初，合并组建的新武汉大学开学，接替殷增涛负责环境整治的涂勇副

市长，率领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桂园路现场办公。察看环境后，涂勇对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监察大队长袁建梅说：建梅呀，这里的整治就交给你吧，你带一帮人和拆迁设备来，住在武汉大学，7天完成任务，标准是六个字：墙倒（违章建筑全部推倒）、渣清、地平，一周后我来验收，达到六个字标准后交给学校修路“美容”。

袁建梅二话没说，带领团队在学校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挑灯夜战，仅用6天做到了墙倒、渣清、地平，提前完成任务。

9月下旬，武汉大学接着改造桂园路，至12月初竣工。路面从4米增宽至12米，全程铺沥青路面，通讯电力电缆“明改暗”，两旁栽树，空地设置花坛。

“铁疗”和709所借地回归

“铁疗”是铁道部东湖疗养院的简称。1954年为支援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国家高等教育部同意将珞珈山东山头的46.68亩土地，借给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修建苏联专家招待所。1957年大桥通车后苏联专家回国，1958年该所改为中国铁路职工疗养院，1994年定名为铁道部东湖疗养院，隶属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4月30日双方办理移交手续，“铁疗”人员当晚全部撤离。借用49年的土地回归。

709所源于1956年9月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研究室，研究室主任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教授李国平。1958年借用桂园路西侧地块19.65亩建楼，由于其所在处影响学校总体规划建设，其长期开墙出租经营商业活动也有不利影响，2008年9月20日外迁达成协议，2009年11月20日全部迁出。



古朴典雅的武汉大学樱顶

媒体聚焦焕然一新

在校园环境整治中，武汉大学注重内因抓根本，还管理欠账，相继完善外来人口、学生宿舍、出租房屋、商业网点、交通设施等一系列管理规定，健全校园 24 小时巡逻、要害部门重点保卫、家属区门栋值班等制度、防火防盗安全责任制度。

同时，学校自身的环境创新工作步步深入。1995 年，采取“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办法，任务到单位，责任到领导，强拆了家属区 178 处违章建筑。1998 年前后，拆除 99 栋共计 49322.78 平方米的危旧平房和棚屋，端掉校外人员的“避风港”。1998 年，搬迁集贸市场，解决了家属区环境秩序混乱问题。

1999 年 11 月至 2000 年 5 月，拆除围墙完成沿东湖 3000 米的“透绿工程”。校园内则实施“黄土不见天”工程，拆除一块，绿化一块，美化一块，空地总绿化率达 96.6%。

2000 年 11 月，在学校大门右边建造 47000 平方米的大草坪。著名学者、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熊礼汇不胜欣喜，提笔为赋：

“美哉珞珈，嫣然灿然！春樱花白如雪，夏榴花红浴燃，秋桂香飘熏人醉，冬梅花绽树树妍。……好一副立体山水画，挂在中国大武汉！”

2000 年 9 月 4 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率队组成新闻采访团，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央视、央广、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中央媒体，聚焦武汉大学校园环境整治情况，刊发一系列深度报道。

2001 年 2 月 26 日，武汉市委、市政府授予武汉大学“武汉市环境创新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徐应荣，曾任武汉大学“二·二七”办公室副主任；任珍良，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助理兼校长办公室主任、“二·二七”办公室主任；刘家旭，曾任武汉大学财务部长、校长助理兼基建部长；任怡，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解放初期武汉房屋的状况与修缮

◇ 方 宏

武汉解放初期百废待举，许多房屋年久失修，政府着手开展修缮工作，大力解决“房荒”问题。1957年前后，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武汉房地局）系统调查了全市房屋的历史形成状况，对年代久远的建筑进行分类，建立完善房屋修缮保养制度，延长房屋保固年限、改善市民居住条件。这些60多年前的资料，对于今天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仍具有参考价值。

房屋状况与历史形成

据1951年武汉房地局调查，全市房屋50%是茅草芦席木板棚房，即使砖木结构房也以单砖灌土墙为多，总体建筑质量较差。

据1957年《武汉房地产工作的汇报》统计，全市正规房屋15524585平方米，建筑时期如下：抗战前7118930平方米，占45.8%；抗战期间625185平方米，占4.03%；抗战后1155480平方米，占7.44%；解放后6482528平方米，占41.76%；年份不明142462平方米，占0.91%。

1957年，公房之外的民房有122435栋，建筑面积6816467平方米，其中一般市民占62.51%，职工占35.17%，房地产出租者占1.91%，华侨占0.28%，外侨占0.13%。

武汉的房屋建筑，随着时局和市场的变化而发展。辛亥革命前，只有旧式商店和民房，无人专门经营房地产。清朝衙门除在房地产买卖时验契征税和为防捻军修筑城



1954年，防汛队伍经过的汉口街道商铺

堡征收房租外，无其他管理。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围剿镇压炮战两月，毁坏房屋较多，特别是冯国璋纵火三日，汉口几成焦土。

待到民国建立，时局相对安定，商业逐渐发达，现代市场形成，因房屋缺乏而租金增高，地价也不断上涨，房地产投资变得稳定可靠。于是，银行、外商、买办，官僚、公司、一般工商户、营造厂以及教会、善堂、会馆等纷纷建房筑屋，现代建筑开始大量出现。房主组织房地产业公会，房屋多的还设立经租处对外经营，华侨巨商伍咏州就在1924年和1936年，分别以白银25万两和银元34万元购置房屋。

这一时期，房屋保养较好，较高级的要油漆门窗、粉刷内墙顶棚、地板上蜡、楼梯铺地毯。

武汉沦陷期间，时局动荡，百业萧条，建房绝无仅有。初期，日寇到处划定军占区，大量拆毁民房。即使非军占区，房屋也常遭破坏。后期，美军飞机时来轰炸，房屋损失也较多。据档案中拟向日寇索赔的材料披露：毁坏地区达8000亩，毁坏房屋10177栋。日寇对公房设有清理机构，对民房虽公布租赁办法，但目的不在管理，而是由警察局据以掌握住户动态，防范抗日活动。由于业主大多逃亡，房屋委托别人看管或被占住，大多是二房东，无人修缮保养。

抗战胜利后，人口剧增，房屋缺乏，但因物价猛涨，除小房主以银元或米来计租外，大房主限于国民党政府法令以纸币计租，经营房屋无利可图，因此建房的很少。

解放后，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武汉进入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高峰期，武钢、长江大桥等13个项目集中开工，为之服务的勘测、设计、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物资



清末武汉长江边的平房建筑



民国初期汉口中山大道内老城区以低矮平房为主

设备供应单位大量产生，加上中央各部委派驻武汉的机构等，对房屋的需求猛增，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迅速开启。

民房修缮与公房排查

武汉原有房屋结构简陋，房龄更是老化，低者二三十年，高者近百年，绝大部分超过使用年限。据1955年统计，市区五个区（不包括郊区）的111001栋房屋中，茅草芦席木板棚房等临时房屋占49.84%，砖木结构以上正规房屋占50.16%。砖木结构中，武昌、汉阳、硚口三区多是单砖灌土墙，因年久失修而损坏严重。

1954年以来每年雨季，全市普遍发动房屋修缮行动，逐渐日常化。1955年发出《关于加强本市房屋管理工作的指示》，将民房的检查与维修列为街道的经常性工作之一。当年，从4月1日至6月20日，市区共查

处危房6770栋，修理完工4275栋。其中，学校、私营工厂和公共场所等危房163栋，修理完工94栋。

为了照顾贫困市民修房，政府采取贷款、救济等办法予以扶助，其中贷款1030户，金额91478元，修房1096栋；救济137户，金额2897元，修房137栋，得到贫困市民的热烈拥护。

对全市公共房屋的损坏情况，从1953年开始进行排查，分为影剧院、工厂、学校、茶馆、酒楼、旅社、浴池、菜场等类型，基本摸清了家底。

影剧院以汉口、汉阳为例：市文化局所属16家影剧院中，除中南剧场尚好外，中原、解放、武汉、民主、人民、新汉、和平、光明、民众乐园、汉剧院、楚剧院等11家国营影剧院，以及群建、新建、民联、协成等4家私营剧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情况。特别是私营剧场的情况较为严重，对观

众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如民联的堂厅、后厅台架由拼凑而成，材料单薄，梁柱弯曲，扯幕布时摇动整个屋架，且在后台搭有二层楼板用于演员住宿、堆置杂物，加重了屋架的负担而非常危险；协成的堂厅梁柱虽经加固仍未免除隐患；群建后台屋架歪斜；新建剧院屋架缺“剪刀撑”，均急待修缮处理。

工厂以硚口区为例：120家中小型工厂中，认定63家“危险”、25家“最危险”。汉中路力强织布厂屋架歪斜，两根柱子折断，楼面下陷一尺多，只打了一根支顶，楼上仍有三四十人生产作业；长堤街前进布厂使用千佛寺的房屋，歪斜严重，仅打了两根斜点维持。

茶馆、旅社、菜场以江岸区为例：50家茶馆中，认定31家“危险”，13家“最危险”；50家旅社中，认定39家“危险”；13家菜场中，认定5家“最危险”。



1931年，洪水中的明星大戏院（今武汉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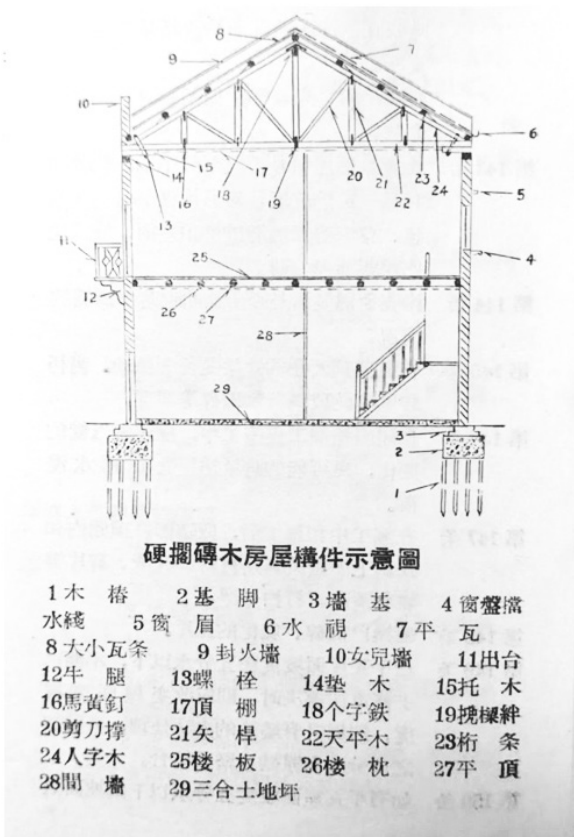
公房安全涉及人数众多，排查出的危房迅速得到修缮，基本消除了隐患。

房屋管理与保养标准

1950年，武汉房地产管理处制定房屋房租标准，将房屋分为9类。其中，两层以



1950年代新修的解放大道及建筑



砖木房屋的构件图

上钢骨水泥翻砂房分为4类，二层砖瓦房和外墙中立柱房分为2类、砖瓦平房、土瓦木板房、竹编墙草顶房分为3类。

1956年，武汉房地局出台《武汉市城区房屋租金标准》，按照房屋的结构、成色、设备、城区等条件，分类分级制定。房屋结构按武汉房屋的特点，参照房地产评价所分房屋结构类型而制定。当时房屋大多系抗战前的建筑，这一分类标准反映了全市房屋的基本面。

1956年，武汉房地局又出台《房屋结构类别及建筑条件标准表》，根据房屋结构、建筑条件、相应设施、耐用年限等，将房屋分为十大类：1.全部钢骨水泥结构、2.甲种混合结构、3.乙种混合结构、4.丙种混合结构、5.甲种砖木结构、6.乙种砖木结构、7.丙种砖木结构、8.丁种砖木结构、9.木柱架板

壁结构、10.竹泥壁结构。主要条件包括梁柱、外墙、内墙、楼地板、屋面、门窗、顶棚等，参考条件涉及暖气、卫生间、自来水、电灯等，非常详尽细致，为房屋修缮提供了充分依据。

1957年，武汉房地局出台《房屋分级保养标准》，全文共分十四章，包括总则、基础、墙壁、楼地面垫层、楼梯、屋架、屋面、门窗、自来水、下水道、电力照明、暖气、升降机和附则等，不仅涉及房屋的结构，还有自来水、暖气、升降机(电梯)等配套设施。根据持之以恒的原则，执行一般性、维护性维修保养，以保障房屋应有的保固年限。由于老房子木材使用多，标准中含有许多传统木作工艺，今天已经鲜见或失传，成为珍贵的一手资料。同时，标准也包括旧租界的洋房和民国时期的高档别墅，涉及电梯、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的维护。由此可以推测，标准的制定者是一群非常专业的人员，针对的都是老房子的代表性问题。今天，利用这些尘封已久的资料，对老建筑重焕光彩不无借鉴意义。

方宏，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原特约信息员，民建江岸区会员